

秦刻石李斯书法研究

**A STUDY ON LI SI'S CALLIGRAPHY IN THE STONE
CARVINGS FROM QIN DYNASTY**

刘晓曼
LIU XIAO MAN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中文硕士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y 2023

秦刻石李斯书法研究

**A STUDY ON LI SI'S CALLIGRAPHY IN THE STONE
CARVINGS FROM QIN DYNASTY**

By

刘晓曼
LIU XIAO MAN

本论文乃获取中文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May 2023

摘要

李斯为秦朝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其少为郡吏，曾从荀卿学，因其在“书同文”背景下出色的书法创作成就和影响，东晋王羲之、宋代羊欣等论述主张李斯开创了中国书法创作先河，称其为“书家第一人”。关于李斯的书法定位问题，目前尚存在着一些不全面的观点。论文尝试从李斯书法创作在“书同文”背景下对秦政权巩固、中国文字史、中国书法史等方面的影响角度出发，展开研究。

论文从秦统一六国，结束诸侯国各自为政的历史背景入手，讨论在“书同文”背景下李斯书法的创作。笔者结合历代古籍及现当代学者著书中对“书同文”政令、“李斯书法”等的记载与点评，讨论得出“书同文”推行的效果，引出李斯书法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随着秦统一六国的发展，社会亟需一种思想文化纽带来带领及教化民众，文字就是沟通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及渠道。李斯书法作为官方文字出现在秦皇权彰显产物——秦诏版、阳陵虎符、秦刻石等之上，是值得探究和讨论的。同时，该书体对于秦政权巩固的作用及影响也是值得整理、分析和考究的。

在对李斯书法作品的整理过程中，自然地呈现出汉字的演变过程。通过表格对比分析，发现李斯笔下书体的存在，是中国汉字演变过程中重要的过渡环。同时，其书体的造型也在“去象形化”的过程中彰显着对文字“造型美”的追求，这是汉字走向书法艺术的有力证明。由此分析，从中国文字史发展的角度分析，李斯书法是“古文字”与“今文字”承上启下的重要见证。从中国书法史的角度分析，李斯书法也启蒙了汉字向书法文化的发展。

论文研究过程中，由浅入深，发现李斯书法的种种影响均构建在秦“书同文”背景下。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图文互证法、多学科交叉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分析“李斯书法”的创作及影响，力求新义新论。

关键词：李斯书法、小篆、书同文、中国文字史、中国书法史、秦七刻石

Abstract

Li Si was a statesman, writer, and calligrapher of the Qin Dynasty. Li Si was a county official and studied from Xun Qing. Because of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 in calligraphy cre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hu Tong Wen", Wang Xizhi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Yang Xin of the Song Dynasty, etc. indicated that Li Si created a precedent for Chinese calligraphy creation, and as he "the first person to create Chinese calligraphy". There are still some incomplete views on Li Si's calligraphy orient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hu Tong Wen", the thesis attempts to conduc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luence of Li Si's calligraphy creation o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Qin regim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riting,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thesis starts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Qin unifying the six countries and ending the country's divided, and discusses the creation of Li Si's calligraph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hu Tong Wen". The author combines the records and comments on the "Shu Tong Wen" and "Li Si's calligraphy" from the ancient books of the past dynasties and the book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cholars. And then, discuss the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hu Tong Wen", prove the influence on Li Si's calligraphy in this proc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Qin's unification of the six countries, society urgently needs a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bond to lead and educate the people, and words writing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channel for communication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Li Si's calligraphy, as the official text, appeared on the products of Qin's imperial power - Qin Zhao version, Yangling tiger talisman, Qin carved stone, etc. It is worth exploring and discus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the book style o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Qin regime is also worthy of sorting,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arranging Li Si's calligraphy work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as presente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ab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 calligraphy written by Li Si. This is an important transitional link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shape of its calligraphy also shows the pursuit of "beautiful shape" in the process of "de-

pictographic", which is strong proof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moving towards calligraphy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riting history, Li Si's calligraphy is an important testimony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ncient writing" and "modern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history, Li Si's calligraphy also enlighten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calligraphy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search of the thesis, from the simple to the deep, it is found that the various influences of Li Si's calligraphy are all construc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hu Tong We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reation and influence of "Li Si's Calligraphy" utiliz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picture-text mutual proof method,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and strives for new meanings and new theories.

Key words: Li Si's calligraphy, XiaoZhuan-calligraphy, Shu Tong Wen, History of Chinese word writing,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Qin Dynasty “seven carved stone”

谢辞

一路走来，硕士从入学至今已两年之久，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此刻的谢辞写的如此平静。这期间困难重重，但都已经成为了深刻的回忆。能走到今天，有赖于老师、家人、朋友的鼓励和陪伴。

首先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陈明彪老师，陈老师从论文开题一直关注我的论文进度，给予了充分的指导。尤其在我论文写作章法不明、方法不对的时候，耐心地指导和讲解，对一些细节错误方面的批评指导也不放过，何其有幸得此良师。同时感谢陈老师的诸多照顾，对我的论文修改及提交时间费心筹划，内心非常感动也很感谢，感恩有您！此外，身在异国，诸多感慨，感谢廖冰凌老师、郑文泉老师、李笑慧老师等中华研究院的其他老师对我生活及心理上的关怀，不厌其烦的解答我的疑问，让我倍感温暖。

感谢家人，无条件支持我，鼓励我，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从来不“泼冷水”，你们是我坚强的后盾。无比珍惜在学校图书馆、自习室的学习时光，自本科毕业后工作的几年内忙忙碌碌，所以能够重获校园学习的机会，我是无比珍惜，不敢懈怠与浪费时间。

感谢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及同学们，尤其是室友 Vikei、Kathrin, 一起学习，相互鼓励，在我学习、生活等方面需要帮助的时候从来不曾拒绝我，帮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祝愿拥有美好及光明的未来。感谢很多次在图书馆帮忙找书的华人老师，感谢风雨无阻接送我到校的公寓摆渡司机，虽不知其名字，但依旧感激。

最后，感谢努力的时光，期待能够拥有继续学习的机会。再次感谢导师陈明彪老师，感谢不吝指导激发了我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祝万事胜意。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秦刻石李斯书法研究为刘晓曼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日期：

2023.5.8

(陈明彪)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2023 年 5 月

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刘晓曼（学号：21ULM00467）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陈明彪博士指导之下，已经完成此题为秦刻石李斯书法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数据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刘晓曼 Liu Xiaoman

（刘晓曼）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 刘晓曼 Liu Xiaoman

日期： 2023.05.04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及目的.....	2
一、研究动机.....	2
二、研究目的.....	4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范围.....	5
一、研究方法.....	5
二、研究范围.....	6
第三节 文献综述.....	7
第四节 论文难点.....	9
第五节 论文框架.....	12
第二章 李斯的作品及时代背景.....	14
第一节 李斯生平及作品简介.....	14
一、文学作品行文严谨.....	15
二、篆文作品字形规范.....	16
三、石刻作品记功颂德.....	17
第二节 李斯佐助秦始皇提出“书同文”的建议.....	18
第三节 本章小结.....	23
第三章 秦刻石中李斯书法的内容分析.....	24
第一节 以《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为例之分析.....	25
一、《琅琊刻石》之书体分析.....	26
二、《泰山刻石》之书体分析.....	29
三、《峰山刻石》之书体分析.....	32
第二节 李斯书法单字对比剖析.....	34
一、规范书写部件，化繁为简.....	37
二、确定文字结构，重视比例.....	37
三、美化呈现效果，去象形化.....	38

第三节 本章小结	39
第四章 李斯书法在“书同文”背景下的影响	41
第一节 李斯书法为秦代巩固政权之载体	43
一、秦刻石之字体与秦权威彰显的剖析	45
二、秦诏版、阳陵虎符字体与秦权威彰显的剖析	47
第二节 李斯书法影响少数汉字的演进	52
一、“书同文”为汉字演进创造条件	53
二、李斯小篆影响少数汉字演进	55
第三节 李斯书法启发并影响中国书法史	57
一、李斯创作启发汉字向书法的演变	59
二、李斯书法影响秦后书法的发展	6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64
第五章 结语	66
第六章 参考文献	68
附录	72

第一章 绪论

秦统一六国（公元前 221 年）前，诸侯国政体独立，礼崩乐坏，各自为政，文字没有统一的编排体系，且文字造型各异。文字系统的紊乱给当时社会政令推行、经济沟通、文化交流等造成了严重障碍。秦统一六国后，始皇决定将统一文字作为疆域治理的第一要务，令丞相李斯（公元前 284 年—公元前 208 年）、中书府令赵高（？—前 207 年）和太史令胡毋敬（生卒年不详）等人，对文字进行系统的整理，形成了“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天下统一使用文字——为秦政“书同文字”¹策令推行所服务。

“书同文”最早出现在《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²，但在岳麓书社出版的由钱玄（1910—1999）等人注译解释此句云：“有人认为此句为后加”³，故“书同文”存在争议。之后，在司马迁（公元前 145 年—公元前 90 年）《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对秦时政令记载讨论，“一法度横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⁴。然以上两种最早的关于“书同文”的概念是在不同社会条件及背景下提出，本文重点研究秦时“六王毕，四海一”社会背景下的书同文字推行境况。

身为“秦篆”，或称“小篆”整理主导者之一的李斯，其为秦朝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本文将就李斯开创了中国书法创作先河这一观点展开讨论。当前张国擎⁵、刘鹤翔⁶等就“李斯乃中国书法鼻祖”一议题，从李斯书法特征、秦刻石、李斯书法资料、李斯书法创作的贡献及其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其中褒扬居多。

论文将以“书同文”政令的推行为背景，围绕李斯笔下作品表现形式展开剖析。研读张怀瓘、康有为、陈思、裘锡圭等相关著作，并以严谨的论点论据为切入点，力证“秦七刻石”为李斯亲笔撰写，以作为本文研究之前提。论文还将寻找史书中关于

¹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卷六，页 304。

² [汉]郑玄，《礼记·郑注》（台北：新华书局有限公司，1989），卷 16，页 188。

³ [汉]钱玄等，《礼记》（湖南：岳麓书社，2001），卷 31，页 713。

⁴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04。

⁵ 张国擎，〈书法鼻祖李斯——历代书法人物之李斯〉，《当代》2019 年第 2 期，页 215。

⁶ 刘鹤翔，〈文化学视野下的“秦七刻石”〉，《中国书法》2015 年第 10 期，页 35。

李斯书法（斯篆）的相关记录及评析记载，整理及分析之。其中，《历代书法论文选》中收录的张怀瓘（生卒年不详）《书断》中，其对李斯书法的评价为：“李斯即小篆之祖也……李君创法，神虑精微，铁为肢体，虬作骏騑，江海渺漫，山岳峨巍，长风万里，鸾凤于飞。”⁷《书断》中另评价李斯为小篆神品（仅此一名），大篆妙品，共有四人（另三人为赵高、蔡邕、邯郸淳），评价相当高。清康有为（1858-1927）在《广艺舟双楫》中称：“相斯之笔，函如铁石，体若飞动，为书家宗法”⁸。鲁迅曾评说李斯小篆言曰：“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⁹。

小篆作为书法史发展过程中起重要承上启下作用的书体，从字体的形体结构和章法布白等方面分析都是讨论点。线条是书法表现中最基本的手段，中国书法中线条所独有的力量感、立体感、节奏感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不同的气质和情调，构成了书法线条的独特美学特征¹⁰。因此，笔者对“李斯书法”书体的线条、字形、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掌握其书体魅力，进而结合史学及社会背景分析“斯篆”在书法领域之影响。

研究任何艺术的发展注定要结合其历史发展背景来进行深入分析，抛去社会背景谈“文化探索”、“文化发展”、“文化进步”是不合理的。由此，笔者将题目定为“秦刻石李斯书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本文的研究方向与重点——立足于秦统一六国后的文化领域中“书同文”的政策背景，结合社会各领域发展状况，运用比较法、附图法、多学科交叉研究法等，围绕秦刻石中李斯书法创作特点、创作意义、社会影响及历史内涵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得出研究的创新。

第一节 研究动机及目的

一、研究动机

李斯不仅是秦代政坛上的一位明星，而且他在秦代“书同文”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汉字书法艺术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史记·秦始皇本纪》文中记载，秦

⁷ [唐]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卷中，页160。

⁸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卷下，页785。

⁹ [民国]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卷5，页24。

¹⁰ 宗宏宇，《论中国书法线条的审美价值》（河北：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页7。

吞并六国后，身为廷尉的李斯建议秦始皇废止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李斯在秦统一法令、度量衡及文字等方面也付出了努力。

统一文字方面，据《说文解字》叙中对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记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¹¹。李斯等人作《仓颉篇》等篇，供人临摹，为新的大一统王朝提供了通俗识字读本和标准文字。这一字体被广泛铭刻在名山大川和朝廷器物上，反映出秦朝独特的时代风貌和政治思想状况。¹²李斯等人主持整理推行统一字体被称为“小篆”¹³。

秦王朝实行“书同文”政令，李斯等人领导从臣对汉字的书写形式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规范整理。在此过程中逐渐将汉字在工具之上赋予了审美意义，逐渐改变着语言与思想工具的随意性，而且还对汉字艺术的创作提供了规范化的引导。

从书法鉴赏角度来看，李斯书体的表现为笔画圆转流畅，归于整齐，大小划一，粗细一致，结体匀称，字形呈长方，取纵势，富有端庄美和肃穆气，体现秦国彼时国情之博大与庄严。研究李斯书法将从文字学史中提炼出汉字发展过程的关键环节，梳理出文字演变的思路，更好地整理中华民族伟大文字事业的发展轨迹，进而寻找到中国书法史文化之启蒙与发展源泉。

从社会表现来看，李斯书法在秦专制的背景下短时间内融入和运用到各领域。其书体创作与推广伴随着“书同文字”政令的推行，研究尽可能考虑到“李斯书法”在彼时社会背景之下的施行影响力，让文章的史学研究方面更具丰富性与生动性。

选择“书同文”背景下进行“秦刻石李斯书法研究”，是一个较为少见的研究方向。当前国内外学者撰写有以研究李斯书法创作形式特征的专题文章，有以李斯书法结体形式或书体来源探索类文章，但将背景定义在“书同文政治方向”之下对秦刻石李斯的书法研究还是一个较为新颖和独特的方向。

由此而论，选择“书同文背景”是凸显李斯身为秦始皇谋臣宰相身份的独特性，不可抛开“书同文”政治背景研究李斯书法。同理，研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治理国政

¹¹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页758。

¹² 刘鹤翔，〈文化学视野下的“秦七刻石”〉，页30。

¹³ 原文载“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758。

过程中的文字统一也不能抛开“书同文”推行过程中的重要桥梁——李斯书法。

二、研究目的

在李斯从政的过程中，他本身就是确立书法法度的人，他集大成发明的小篆成为后世参考的标准书法。自他起，篆体第一次有了规范的书写标准，而且被发扬光大，历代沿用。笔者将融合自身对秦朝政治背景下的社会各领域发展及表现形式思考，收集各类古籍文献资料，运用多角度的研究方法，系统化对“秦刻石李斯书法”的影响及意义进行梳理，从不同角度切入，如：李斯书法对国家统一巩固成果的影响、对部分汉字发展的影响、对中国书法史的影响等。

张怀瓘、康有为等人的研究一部分关注于李斯书法创作书体本身的特征——文字结体规范、作品美观大方等；一部分研究主要涉足于李斯对秦始皇大一统的治国政令推行的重要意义。而针对在“书同文”背景下李斯个人书法创作的产生对多领域的重要影响还需综合考量及商榷研讨。

笔者将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法梳理出李斯书法产生的背景及影响。客观的将李斯书法创作的历史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融合进去，多方面综合思考。而抛开背景研究“文化发展”、“历史影响”是较为空洞的，故本文将立足秦国统一六国背景研究李斯书法，围绕李斯书法的评价论其多方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选题旨在对李斯书法的全面研究进行整合，以“书同文”政令推行为研究背景是一个特别的角度。此一方面将对李斯书法的作品进行梳理整合，运用文体剖析、字体线条结构分析及作品整体鉴赏等评析方式，分析该书体对中国文字史、书法史领域的具体影响。另一方面将结合“书同文”背景对李斯书法的产生在社会、文化领域及文史融合方面产生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再者，国家大一统推动了文字统一，文字统一也对秦大一统政权之巩固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李斯书法运用过程中对各领域发展影响的分析，达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目的，也将捋顺该书体的发展脉络。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范围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图文互证法、多学科交叉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从细处深化李斯书法创作的背景，结合“书同文”的政治决策，以及在“书同文”政治发展背景下该书体的发展与风格变化，构建起较为清晰的关于秦刻石李斯书法影响及存在意义方面的思路。

（一）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特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收集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达到研究目标的一种方法。

“书同文字”的过程，是对数以千万的汉字进行系统整理，这个过程的大背景是“秦统一六国”，这也在书法研究领域产生划时代的影响。通过查阅研究李斯书法、秦统一小篆相关的文献、专著、书法作品评析文等资料，汇集与本论文有关的理论与文献资料，分析李斯书法创作的时代背景及实践意义。笔者将尽可能整理关于李斯书法、秦石刻文等方面的文献资料，通过整理研究，梳理出本文所需的材料，为论文提供理论依据。

简言之，文献研究法主要围绕历史典籍中对李斯书法及相关史料的探讨，用文献来佐证及启发讨论本文的论点及研究方向，增强本文论点之说服力。

（二）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是依据客观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通过类比，借以对研究目标作出相应的逻辑分析。

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归纳秦系文字发展及李斯书法的拓展实施过程；通过与秦统一初期六国文字字形进行横向比较，分析描写李斯书法整体特征及意义影响。通过引申拉丁文字的产生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对比思考文字发展及文字体例的建设在国家统一、文化传承及文明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图文互证法

“图文互证”是通过图像与文本的相互对比来进行观点论述强调，达到互相佐证、相互支撑的目的，是历史研究重要的方法之一。

文章将结合图例进行直观的对比分析，通过图片（截取李斯书法作品标志性文字片段）对李斯书法的外形结构进行整理并深度分析。如涉及李斯书法、书体、书风以及结构布局等方面的问题，则附相关图例进行分析，如将石刻图版、阳陵虎符、秦始皇帝四十字诏书等图片附于相关解析陈述文字之后，进一步阐释所讨论的问题及观点，从而达到图文互证的目的。

（四）多学科交叉研究法

多学科交叉研究法是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多学科理论并用、突破思维定式和固有的理论模式是文史学科研究的总体趋势。

李斯书法的存在与发展问题与社会政治、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维视角下结合多学科理论展开探究有助于启发研究。

多学科交叉是紧扣本文整体研究背景及主要研究方向的一种方法，同时也将贯穿本文研究结构及思路构建。笔者将融合文字史、文化史、书法史等学科理论，重点将李斯书法的诞生对书法史、社会表现形式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进行整合梳理。

二、研究范围

选题研究主要围绕“书同文”背景、秦刻石、李斯的创作、李斯书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同时，研究将结合当时秦大一统背景下文字发展特征，同时以李斯“秦七刻石”作品——峯山刻石（公元前 219 年）、泰山刻石（公元前 219 年）、琅琊刻石（公元前 219 年）、之罘刻石（公元前 218 年）、东观刻石（公元前 218 年）、碣石刻石（公元前 215 年）和会稽刻石（公元前 210 年）等相关资料为基础展开对书法字体字形的分析。

本文的研究范围将在当前国内外学者对李斯书法艺术特征研究、书法创作意义的

基础之上展开，从而进行论点的再挖掘、再拓展，探索其作品内涵。并对“李斯作品撰写内容及主题”“李斯书法诞生及政治背景”等进行剖析，为文章的综合研究奠定基础。

研究还将以各类文献资料为切入点，努力寻找更多关于李斯政治生活背景下的书法创作渊源，剖析例证李斯书法诞生的意义及影响，并捋顺李斯书法在中国文字史、书法史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足迹。

第三节 文献综述

从学校图书馆、CNK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华艺线上图书馆、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等网络平台查阅有关于李斯书法作品的文献研究书目及学术论文数篇，从李斯具体书法作品评析、史书记载李斯书法评价、李斯书法（斯篆）特征、秦篆书体特征作品举例论证等方面对李斯及其书法评述相关文章进行收集。

同时，论文收集了古代文献《说文解字》、《水经注》、《史记》等；文章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历代书法论文选》、《观堂集林》等；专题研究文献：《中国文字学》、《中国文字史》、《文字学概论》、《中国篆刻史》、《中国史稿》等著作中对李斯书法的评论。结合“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收集古籍文献，印证《仓颉篇》、“秦七刻石”等出自李斯之手。过程中发现，学者们对李斯书法艺术的研究从多个方面切入，其中对其生活背景——秦始皇大一统背景下的研究特征鲜明，认为李斯在秦统一文字的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小篆者，李斯造也……其势飞腾，其形端俨。李斯是祖……”¹⁴。

《说文解字》、《水经注》、《文心雕龙》等古籍中有对李斯书法创作有明确记载（在文中“论文难点”部分有具体列出）。

《历代书法论文选》是本文重要的参考文献，该书概括了历代学者的书法评析，是书法研究中的权威性参考资料。其中王羲之的《书论》、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等均有对李斯为“书家”¹⁵之记载。收录张怀瓘的《书断》中有中肯的关于李斯书法与小篆书体评价及重要论述。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对李斯刻石作品有具体记载及

¹⁴ [唐]张怀瓘，〈六体书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页212。

¹⁵ 书家，即书法家，书法家是擅长书法的人；具有汉字书写能力，并能将其推至艺术高度的人。

评析。陈思的《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中对李斯书法及小篆发展特征有具体描述。

简直撰写的《悲剧性的书写——评李斯的书法》¹⁶，从李斯生活的背景之下分析其命运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发现其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政治思维的影响。他的书法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规范、漂亮、抒情等特征。简直的研究大多关注其创作内容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原因，鲜有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法。

张国擎的《书法鼻祖李斯——历代书法人物之李斯》，祝唯庸的《李斯和他一统天下的小篆》等研究立足李斯的书法创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思路。同时，以上论文中从中国书法史方面提炼李斯书法（小篆书体）的发展脉络，以及发展方向。

台湾学者韩复智¹⁷的〈对〈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新评〉的新评〉中，他结合《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将历代中国书法及中国文字的演变进行对比研究，重点就秦朝小篆文字的字形与结构进行了剖析，此文对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

苗江磊引用《书断》中对李斯书法特征进行评论并形成观点。后世对李斯书法功绩的评说之中，尤以唐代张怀瓘《书断》之言最为溢美。他称小篆乃李斯所作也，其书天下行之，并称李斯之篆书有“‘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之貌”。¹⁸该论文期刊其中的描述仅赞誉了李斯书法艺术特色，对小篆之书的肇始之功有所夸大。他所提及的“李斯作小篆”、“天下行之”等诸语，并未运用有力的文献进行辅助支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¹⁹一书是对先唐文献具有总结性的一件伟业。该书中对全秦文字进行收录，其中秦始皇、秦二世、李斯等篇目的整合与梳理，皆为本文研究及相关资料佐证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与梳理思路。

由此可见，“秦刻石李斯书法研究”过程中除摘录各类文献资料中对其书法正面特征的评价，且需依据古籍文献记载，结合时代背景，进而全面把握该书体的特征，从而对本研究课题进行探究及讨论，以获得研究成果。

¹⁶ 简直，〈悲剧性的书写——评李斯的书法〉，《休闲读品》2016年第2期，页88。

¹⁷ 韩复智，〈对〈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的新评〉，《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92年第17期，页19。

¹⁸ 苗江磊，〈李斯书法评说的再审视——由张怀瓘《书断》说起〉，《中国书法》2019年第18期，页71。

¹⁹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海：中华书局，1958），全秦文卷，页222。

第四节 论文难点

难点一：

李斯书法大概念的产生必定要有相应的作品图例做以支撑及补充，仅凭《历代书法论文集》或古籍中的零星评析远远不够。要想充分例证观点就必须首先向读者说明“相传李斯书法作品为其本人亲笔书写”。在古籍中寻找充分的有力证据是本文研究之前提。要对中国史学、中国书法史、中国古文字史、中国文字史、历代碑帖集录、汉字学史等多领域古籍展开收集。同时过程中，需学习借助网络搜索引擎提高效率。

就例证《仓颉篇》、“秦刻石”等相关作品为李斯所书言，相关文献记载。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述：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²⁰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中对李斯相关碑刻的来源及内容进行记载：

皇帝二十六年 初兼天下 以為郡縣 正法律同度量 大人來見臨洮 身長五丈足六尺 李斯書也 故衛恒叙篆曰 秦之李斯 號為工篆 諸山碑及銅人銘 皆斯書也。²¹

秦始皇觀禮于魯 登于嶧山之上 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 作名曰畫 門詩所謂 保有鳧嶧者也。²²

秦始皇登會稽山 刻石紀功 尚存山側 孫暢之《述書》云 丞相李斯所篆也。²³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记载，明确了秦刻石为李斯书写的观点，并对书法造型进行了点评。

²⁰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758。

²¹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卷4，页66。

²²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卷25，页379。

²³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卷40，页569。

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²⁴

唐代张怀瓘在《书断》卷上及卷中评析李斯小篆书体，不仅肯定了其撰写小篆体的事实，还用“祖”一字表达其书法的影响力。

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²⁵

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峯山》《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²⁶

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有对李斯书写作品的记载及对其书法造型评析的陈述。

观《石鼓》文字与秦篆不同者无几，王筠所谓其盘穴敢弃，知文同籀法是也。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匾。²⁷

以上文献中“斯作《仓颉篇》²⁸”、“李斯书也”、“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铭山嶺”、“丞相李斯所篆也”、“文自李斯”、“令斯书其文”、“皆李斯所作”等句子的记载，充分证实了李斯书法作品的存在，也将本文的重点研究目标集中在了“刻石”相关作品之上。

论文将分析《仓颉篇》、“秦七刻石”等文字作品皆出自丞相李斯之手，并探寻其书作被运用在“诸山碑”“铜人铭”“玉玺”“虎符文字”“秦权量”“秦半两”等载体之上的痕迹。这些将为文章开展做以铺垫，也是本文研究之前提。解决此问题会让论文研究更具章法，更具说服力与专业性。

难点二：

文章展开论述之前还需要厘清“李斯书法”、“秦篆”、“小篆书体”之概念区分及联系，笔者在论文写作及文献收集过程中深感厘清其中关系的重要性。“李斯书法”不能与“小篆书体”相混淆，论文在研究过程中一定坚持围绕其作品展开相应评

²⁴ [梁]刘勰著、王更生注译，《文心雕龙读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卷5，页389。

²⁵ [唐]张怀瓘，〈书断〉，页160。

²⁶ [唐]张怀瓘，〈书断〉，页176。

²⁷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页785。

²⁸ 本篇在此引用《说文解字》中原文，故写《仓颉篇》，本论文后续均以《仓颉篇》为指。

析，强调不可以将评析“小篆书体”之言论与之混淆。在论文中，任何评析都要结合相关文献记载、相关图例说明，坚持以“李斯书法”为研究重点。

一方面，以文献记载推理出《仓颉篇》（本文以北大汉简版本为参考）²⁹、“秦刻石”等可谓为“小篆”字体。段玉裁在许慎《说文解字·叙》中：“所谓小篆者也”句下注云：“小篆，《艺文志》作秦篆；“而古文由此绝矣。”句下注云：“秦时刻石，皆用小篆。”³⁰

但另一方面，在厘清小篆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对于“小篆”的定义有不一样的研究论述。例如：

1、在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有讲到：经过李斯等人整理的标准字体，在当时未必会有区别于同以前的秦系文字的专门名称。“大篆”和“秦篆”“小篆”等名称应该是从汉代才开始使用的。秦代大概只有“篆”这种字体名称。³¹

2、上文已引用：“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铭山嶺”³²。此句明确提出刻石所用字体为“大篆”。

由此分析，确实可以从文献记载中寻找李斯书法与“小篆”之间存在的联系。但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将李斯书法定义为“小篆”字体还存在矛盾点；同时在古籍中多记载李斯所书为“篆”之意居多，并未过多将其与“小篆”字体相联系。文中由此分析，李斯书法的产生，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了部分汉字的演进。

故本文在分析中，要厘清研究中需重点关注的对象，强调始终要围绕李斯书法作

²⁹ 《仓颉篇》最早的出土，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一带进行关于汉长城遗址的发掘，无意中找到了一批汉简，其中就有《仓颉篇》，一共仅仅四十字。之后，汉简出土中零散关于《仓颉篇》的记载始终不成体系。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的3300余枚西汉竹简，被命名为“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其中的《仓颉篇》是这部久佚古书保存字数最多的一个文本，且保存状况完整，字迹清晰，墨色如新，对《仓颉篇》佚书的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周飞通过对具体字形的举例分析，认为北《仓》中不少字与小篆明显相合，而与同时期的汉简文字有别，并根据这些“很可能是直接从篆文隶定而来”的字形，推测北大简《仓颉篇》直接转抄自秦本。由此，本文将以北《仓》为范本评析李斯书法特征。

³⁰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758。

³¹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页65。

³²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卷25，页379。

品为基础展开论文研究。

难点三：

因本文研究领域确立为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史，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将是文章重点使用的研究方法。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李斯书法”与各领域、各学科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必须关注的要点。

一方面要避免泛泛而谈，将意义及影响分为各大板块容易造成文章研究无中心思想的后果；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将部分融入整体，令文章研究更具深度和专业性。笔者将寻觅一条线索和主线，运用好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把握文章研究主旨，令文章呈现观点更具全面性。

第五节 论文框架

不徒以堆砌史料为能事，不作面面俱到、平铺直叙，对于前人未讨论的问题，则详细说，已讨论过的问题，则深入讲，换角度讲，务在史料的分析中求得新义新论。在绪论中将文章研究动机及目的、研究方法与范围等进行阐述，直面提出论文研究难点并列文献记载重要证据。

正文分四章论述，追求简洁行文，文章之厚薄并不取决于书页之厚薄，充实而有光辉，才是本论文追求的目标。

笔者从李斯书法创作时代背景及代表作品为切入点，在第二章节中交代了李斯的生平、时代背景及作品情况。同时有根据的将其书法作品分类别、分时期进行整理，针对作品特征对比分析，并结合表格总结加以说明。

第三章节则针对秦刻石中李斯书法的内容进行分析，以《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为例展开分析并结合单字进行剖析。过程中列举三刻石作品中的单字进行书法剖析，从书写部件、文字结构及呈现效果三方面推测该书体在推动中国文字史、中国书法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力。

第四章首先分析李斯书法在“书同文”背景下作为皇权权威彰显载体的重要意义，结合石碑刻、秦权量、秦诏版等图例，分析李斯书法在各领域的实践运用及实用影响。接着从其书体对中国文字史、书法史发展的影响出发，分层面展开分析，引用及结合

中国文字史、书法史发展历程，列举诸多图例，创制对比表格，使研究整体更具说服力，更具价值。

文章结语将本文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形成简明扼要的理论总结。

第二章 李斯的作品及时代背景

第一节 李斯生平及作品简介

李斯是战国末年的楚国人，青年为官时期担任小吏³³职位。此项工作日常与文字打交道，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关于其青年时期的故事记载：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庀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³⁴

李斯所处的战国末年，社会动荡，文字系统纷繁杂乱，齐、燕、韩、赵、魏、楚、秦等国使用的古文字造型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文字混乱无序的弊端为日后他力荐秦始皇“书同文”埋下了伏笔。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辞官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³⁵，继而投奔秦国施展政治抱负。

时而正值韩人郑国来间秦，李斯以一篇〈谏逐客书〉说服秦王放弃逐客。〈谏逐客书〉也成为李斯的成名之作。此后，李斯在秦期间先后被拜为长史、客卿、廷尉和左丞相，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做出了贡献。始皇死后，赵高、胡亥篡权，李斯为了保全既得利益，屈从赵高，铸成大错。公元前 208 年，因赵高诬其“谋反”，“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³⁶，并夷三族。

《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中对李斯的人生经历均有相关记载。其中，根据记载时间及作品类型梳理李斯作品，其作品大致分为文学作品、篆文作品及石刻作品三大类。

³³ “小吏”一词索引乡小吏。刘氏云“掌管文书”。[汉]司马迁著、[宋]裴骈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七，页 3067。

³⁴ [汉]司马迁著、[宋]裴骈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七，页 3067。

³⁵ [汉]司马迁著、[宋]裴骈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七，页 3067。

³⁶ [汉]司马迁著、[宋]裴骈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七，页 3091。

文学作品	篆文作品	石刻作品
<谏逐客书> (238 B. C.) <议“存韩”> (237 B. C.) <上韩王书> (233 B. C.)	·阳陵虎符 ·金狄铭 ·绎山铭 ·玉玺文 ·句曲山白壁刻石 ·汉沔碑	绎山刻石 泰山刻石 琅琊刻石 海上议刻石 之罘刻石 东观刻石 碣石门刻石
(本文据《史记》、《水经注》确定在《李斯集辑注》中“峰山”皆作“绎山”)		

图一、李斯生平主要作品分类（据《李斯集辑注》编）³⁷

一、文学作品行文严谨

文学作品<谏逐客书>（公元前 238 年作）、<议“存韩”>（公元前 237 年作）、<上韩王书>（公元前 233 年作）等作均具有政治背景，三篇皆为议论文，开辟了文学史的书体创作先河。

<谏逐客书>是古代公文的典范，这篇作品铺张扬厉，言真意切，对汉赋有直接影响。此篇的立意与意蕴已超越了秦国的地域性，反映出多种文化与思想的融会与包容。其中名句“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³⁸传诵至今，而论述文采飞扬，淋漓酣畅。清人李兆洛（1769-1841）感慨此篇道：

此文若去其中间一节，则了无生趣矣。然语既泛滥，意杂诙谐，虽曰羁旅之臣，要岂陈言之体！玩其华焉可也。³⁹

而<议“存韩”>、<上韩王书>是李斯在秦统一六国期间的政治活动记录，文章言真意切，文章格式和书写表达都是很有特色的，也是李斯参与秦统一六国政治活动的重要证据。公元前 233 年，韩非向秦始皇递呈<存韩>书，提出让秦国将攻打的目标转向赵国的计谋，从而达到存韩以及疲秦弱秦的目的。秦始皇将<存韩>书交由李斯商议，其剖析此篇中蕴含的韩之计谋，遂作<议“存韩”>，力荐灭韩。公元前 233 年，李斯自请作使者入秦说韩，韩王拒见，遂写<上韩王书>。

³⁷ 张中天、王宗堂等，《李斯集辑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目录。

³⁸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七，页 3073。

³⁹ [清]李兆洛，《骈体文钞（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页 155。

纵观李斯文学作品颇具个人特色，字里行间彰显了其“辩才无碍、滔滔不绝”的法学思想，思路与行文结构严谨。他的文学，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的，为达到预期的目的，增强文字的感染力、说服力，常常采取一些写作技巧，包括引用历史事实、类比方法、连珠式的推论法等。

二、篆文作品字形规范

篆文作品“阳陵虎符”、“金狄铭”、“峰山铭”、“玉玺文”等之文字以标准的字形造型记载着政权权威意志。

其中，“阳陵虎符”作为国之重器，其上铭文录自实物，此符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虎形兵符，古时调兵的凭证。而近似李斯书法的规整字体出现在此符之上，更是彰显政治权力的体现。《水经注·河水》、《水经注·泗水》两章中对“金狄铭”、“峰山铭”有相关记载，并论述此两铭为李斯所撰。

《水经注·河水》注云：

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二以象之……李斯书也。⁴⁰

《水经注·泗水》云：

秦始皇观礼于鲁，登于峰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乐铭山岭……⁴¹

再议“玉玺文”，《书断》中云：

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李斯书其文。⁴²

以上梳理文献中关于李斯篆文作品的撰写记载，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史学记载领域得出其篆文作品是有迹可循，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且斯作皆奉皇命所创，“阳陵虎符”铭虽无赘名，但王国维(1877年-1927年)在《观堂集林》中推论“此符乃秦重器，必

⁴⁰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卷3，页66。

⁴¹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卷25，页379。

⁴² [唐]张怀瓘，〈书断〉，页176。

相斯所书”⁴³

由此可见，李斯篆文作品受秦始皇及政权权威委托出现在皇权产物之上，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对其书体的一种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书同文”推广施行的一种现实交代。

三、石刻作品记功颂德

秦始皇刻石为昭示万代，而秦七刻石在秦亡后，因其为秦纪功颂德，被后世反秦者特别是统治者破坏。“秦刻石”有琅琊刻石（公元前 219 年）、之罘刻石（公元前 218 年）、东观刻石（公元前 218 年）、碣石刻石（公元前 215 年）和会稽刻石（公元前 210 年）等。其文载于《史记》的有六篇，其中《峯山刻石》有名无文。通过文献搜集，梳理出李斯做“秦七刻石”文的重要史料，并整理对其书法造型的点评。

《历代书法论文选》一书收录历代学者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评析论文篇章。其中张怀瓘（生卒年未详）《书断》卷中有述：

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峯山》《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⁴⁴

康有为（1858-1927）《广艺舟双楫》卷二分变第五中有提到：

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观《石鼓》文字与秦篆不同者无几，王筠所谓其盘穴敢弃，知文同籀法是也。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匾。⁴⁵

另在施蛰存（1905-2003）《水经注·碑录》中载有对《秦峯山刻石》、《秦琅琊刻石》、《秦会稽刻石》等之描述，其中载：

秦始皇登峯山，命丞相李斯篆书勒铭于山额，曰‘书门’；琅琊台上有始皇碑，碑上有六

⁴³ 王国维，《观堂集林·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卷十九，页 13。

⁴⁴ [唐]张怀瓘，〈书断〉，页 160。

⁴⁵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页 779。

百字可识。余多剥落。李斯书；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记功，尚存山侧。⁴⁶

由此而论，秦《峰山刻石》、《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刻石》等是出自李斯之手，其文字书法造型历代以来受到关注与赏析。书者撰笔随心而变，七刻石产生有先有后，不乏字形结构不同之处。在当时，未尝有印刷体之说，在古时短时间内将“书同文”如此之大工程畅行百里实属困难，以“颂秦德”之刻石来推广统一文字未尝不是好方法。

在古籍中，李斯的刻石作品也是有迹可循的，除专门针对其刻石书法风格的评析外，诸多记载也佐证了李斯书刻石作品的事迹。东晋书法家王羲之（321年-379年）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记载：

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⁴⁷

这样的记载证明李斯之石刻书法作品是可寻踪迹的。南梁刘勰（465年-？）在《文心雕龙》中也有述：

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⁴⁸

《文心雕龙》中的记载，不仅肯定了秦始皇在各山立刻石的事实，还从作品文体、风格等方面对李斯的撰写加以点评。以上分析结合《史记》、《水经注》、《说文解字》等古籍中的记载，可梳理出秦始皇在各山所立石刻是由李斯撰写的线索。

此外，秦刻石具有书法艺术，是研究李斯书法绕不开的对象。从多学科的角度均能梳理出秦刻石同李斯的重要关系，历代学者对其书体作品的丰富点评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线索与思路。

第二节 李斯佐助秦始皇提出“书同文”的建议

《史记·李斯列传》中所记载的“鼠厕事件”，长久以来也被人们形容为不甘平

⁴⁶ 施蛰存，《水经注碑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页267。

⁴⁷ [东晋]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页27。

⁴⁸ [梁]刘勰著、王更生注译，《文心雕龙读本》，卷5，页389。

凡，勇敢追求远大抱负的励志故事，也是李斯仕途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君而侍。李斯辞官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并择选当时国力最强的秦国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⁴⁹

彼时，受韩国人郑国修水渠⁵⁰牵连，朝廷的宗室贵戚为了打压外客势力支持秦始皇下逐客令，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⁵¹秦始皇听信谗言，下令驱逐客卿。

李斯思索良久，站在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高度思考并撰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馀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⁵²

一举成名后，李斯寻得展示自己政治谋略与壮志的平台，博得重用。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李斯就建议秦始皇“书同文”，这与文字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在历史上，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局面大动荡、大整合、相互兼并的剧烈时期。由于文字发展因地域有别，诸侯割据封闭与融合相互碰撞，导致文字发展的过程各不相同，以致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⁵³的现象。同一字的声符、形符皆存在差异，例如一个“马”字，齐国有三种写法，楚、燕、韩、赵、魏也各有两种写法，七国文字千变万化，无一定式。彼时，秦始皇为了结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困境，决定实行“书同文”政策，下令禁用六国遗文，以秦篆为统一书体。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于秦“书同文字”的记载：

⁴⁹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七，页 3067。

⁵⁰ 公元前 237 年，韩国用郑国修水渠的“疲秦之计”被秦王嬴政识破，于是嬴政下令驱逐六国宾客。李斯上《谏逐客书》劝阻，说服秦王撤销了逐客令，从而为秦国保住了人才。

⁵¹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七，页 3069。

⁵²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七，页 3074。

⁵³ 《说文解字》序中有言：“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 758。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⁵⁴

在《说文解字》中也有对秦初并天下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相关记载：

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⁵⁵

由此可见，秦始皇将“书同文字”同国家法度建设并驾齐驱，看出其在政令推行和国家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对“文字统一”及“文字标准”建立的重视性。也正是在秦“书同文”的背景下，作为一国之相的李斯及其书法有了推广的契机。

在历史记载中，李斯为推动秦统一六国后的各类政令推行皆给予推动作用，其中就包含“书同文”政令推行。《史记·李斯列传》中有记载：

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⁵⁶

以上分析，秦“书同文”政令的推行与实践同李斯存在一定的联系。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李斯的治国理政建议是严谨的，他深知国家的政权稳定需要关注社会发展的各环节，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律令、统一车轨等方面入手，达到相互呼应的巩固政权效果。

其中，李斯组建团队推动“书同文”政令的实施，随之问世的《仓颉篇》等作为秦朝启蒙教育的开蒙识字工具，发挥了教育与教化的重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李斯书法”社会地位的确立以启发。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就有对秦《仓颉篇》等的相关记载。

《说文解字》中记载：“斯作《仓颉篇》，中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⁵⁷

⁵⁴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303-304。

⁵⁵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758。

⁵⁶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七，页3075。

⁵⁷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758。

《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⁵⁸

而李斯仕途发展过程中，“书同文”政令的推行与实施也是其政治谋略的重要体现。以《仓颉篇》入手，李斯在统一文字和规范文字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唤起了构建儿童小学教育（古者八岁入小学）⁵⁹启蒙读物和识字通识读本的觉悟。

《汉书·艺文志》中对《仓颉篇》的持续影响力及对汉代之影响做了记录：

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⁶⁰

此外，《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⁶¹汉代将“秦三仓”并为一篇，供人研习，并以李斯之篇为题，说明李斯《仓颉篇》的重要性与权威性。李斯《仓颉篇》之创制，从根源上把控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字，让儿童及民众学习最标准的文字，同时也进一步为“书同文”打下更为扎实的基础。同时，秦《仓颉篇》与“书同文”政策相互影响，互相促进。

钱穆（1895-1990）在《秦汉史》中也总结了李斯创《仓颉篇》的过程，对《仓颉篇》统整六国文字做以概述：

李斯《仓颉》诸篇，乃整理统一其字体。非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全不合，亦非李斯

⁵⁸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页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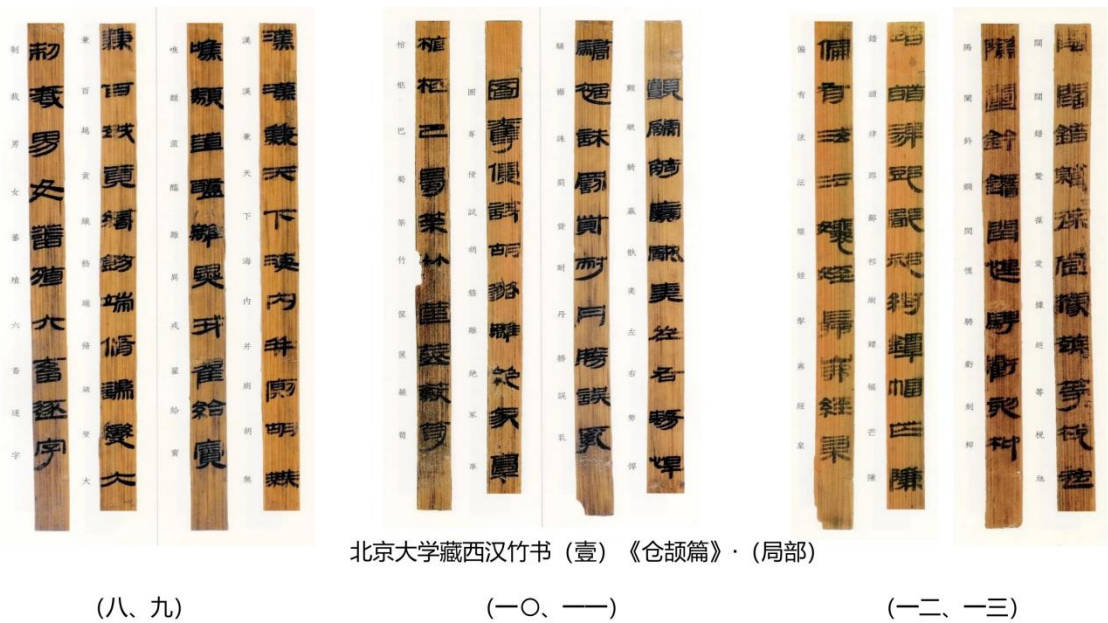
⁵⁹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页18。

⁶⁰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页19。

⁶¹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页19。

尽罢六国之文字，尽使改从秦文字也。⁶²

时至今日，《仓颉篇》真迹虽已不见，但在文字学、史学研究中仍据一席之地，也是可以体现李斯书法原貌的重要史料，更是“书同文”政令推行过程中最具参考意义的资料。现今，北大汉简《仓颉篇》⁶³的整理中，还原了部分篇中文字，给予研究以启发及突破口。



图二、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仓颉篇》局部⁶⁴

通过收集整理和对比“北大仓”资料，发现全篇字形结构、结体造型、笔画趋势几乎近似，通篇似一气呵成。尽管周飞等人⁶⁵讨论“北大仓”是最为接近秦本的摹本，但由于真迹已失，且古籍资料的缺少，从汉简出发研究李斯笔下《仓颉篇》的书法造型略显证据薄弱。

总体来说，“书同文”政令的提出与推行，同秦丞相李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仓颉篇》是秦朝“书同文”政令推行的开端，也是文字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

⁶²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页 33。

⁶³ 北京大学出土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仓颉篇》，现存简 87 枚，其中完简 53 枚，残简 34 枚。经缀连后，有完简 63 枚，残简 18 枚。完简长 30.3-30.4 厘米，宽 0.9-1.0 厘米。有契口与上，中，下二道编绳。简背有划痕，保存有完整字 1317 个（其中含有标题字 15 个，重见字 7 个），残字 20 个。

⁶⁴ 图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1109/17/40044036_1003460457.shtml。

⁶⁵ 详见脚注 29 介绍。

由于“秦本”无从考究，《仓颉篇》在研究李斯书法过程中也便缺少了“话语权”。同时，“书同文”过程中，李斯的创作倾注了其自身对文字体系、书法艺术建设的思考，对其书法创作的研究，也集中展现在其刻石作品。

第三节 本章小结

李斯的生平可以从其为仕过程提取出发展线索，他的书法创作是为他的政治所服务的。整理他的文学作品、篆文作品、石刻作品，归纳李斯书法作品特征，由浅入深，辅以论据，以便后章展开对该书体影响力的分析。

李斯作品以〈谏逐客书〉、“阳陵虎符”及“秦刻石文”等为代表。值得考究的是其“秦七刻石”作品——均系公元前 219 年至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巡视郡县所立，《史记》及相关典籍中均可找到记载。在七刻石作品中也能寻得其书法的艺术魅力所在，刻石文字内容更是记录秦王朝的社会风尚的重要史料，颇具研究意义。

同时，李斯作品的产生同“书同文”政令的推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秦刻石”作品。“书同文字”建议的提出和推广过程中，李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锐意于推广文字的规范化。这就给了秦大一统文化的传承及其他领域的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章 秦刻石中李斯书法的内容分析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共有七碑，即峰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这些刻石经过时代的更迭，有的已经找不到真迹，论文以《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刻石残碑和拓片资料为据分析李斯书法。同时，在秦始皇的专制政权的背景下，不难联想李斯书法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始皇政令强行推广的影响。

以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列举《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碑刻内容分析，其余诸石刻见附录。

《琅琊刻石》共计 497 字所刻。该石是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 年）先后东巡郡县，南登琅琊，在琅琊台上刻《琅琊刻石》（前 289 字），歌颂秦之功德所作。随后，秦二世元年（前 209 年）春，其效仿始皇立刻石威服海内，李斯同行到东巡碣石、会稽等地。李斯奏请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诏书以彰显先帝成功盛德，于是在《琅琊刻石》上加刻诏书（后 208 字），下石刻摘录，详见附录《琅琊刻石》内容。

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转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⁶⁶

《泰山刻石》共计 147 字所刻，该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刻辞）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 年），后半部分（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 209 年），始皇刻辞叙述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申明法令，充分利用法律来保护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各项制度，要求臣民遵循法制，并告诫后代要坚持法家路线，永不改变。下附始皇刻辞部分。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

⁶⁶ [汉]司马迁著、[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10-311。

施于後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⁶⁷

《峰山刻石》原石已遗失，《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立此石，未录其文。据明拓本补录如下，全文共 144 字。该刻石后半部分刻于秦二世元年（前 209 年），前半部分（始皇诏）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 年），共计 144 字，主要呈现始皇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为人民带来的福祉。文如下：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尊惠，亲巡远方。登于峰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阨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⁶⁸

剖析以上三石内容，皆以记录秦王朝社会风俗风气为主，且行文严谨，且均有摹拓本传世，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在彼时，精准掌握文章文体、篆刻法则之人甚少，如此重要之工程则交予丞相李斯之手。李斯的“刻石作品”作为“书同文”政令推行的重要宣传载体，一方面规范的行文巨制是国家文字统一成果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秦朝廷彰显统治权威性的结晶产物。

由此，李斯书法便以最具权威性和体面性的形式——刻石，呈现在世人面前。随着时间的更迭，“七刻石”原迹现今只有《琅琊刻石》（残碑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可寻，《泰山刻石》（摹刻本残碑存于泰山岱庙）、《峰山刻石》的摹刻本最为完整，且有多个版本，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论文选取《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展开分析李斯书法作品。

第一节 以《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为例之分析

作为秦系文字后期的小篆代表性作品之一，它承接了西周以来接近金文的文字形态，又在籀文的基础上省改而成。而西周金文可以上溯到甲骨文，战国中晚期的小篆

⁶⁷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08。

⁶⁸ 据现存西安碑林的《峰山刻石》宋代摹刻碑整理。

通行于秦国，与其他战国文字相比，小篆代表了秦文化的书体。文字造型主要表现在其偏旁部首及其位置相对固定下来，文字部件随意增减的现象减少等。

要分析李斯书法的造型审美，必须要对文字的发展进行剖析。裘锡圭《文字学概论》中述及：

汉字字体演变的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即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前一阶段起自商代终于秦代（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后一阶段起自汉代一直延续到现代。⁶⁹

古文字颇具象形意味，李斯所处之时期，书法艺术处于实用主义时期。也正是秦代的“书同文”工程，才逐渐将文字从象形向造型进行演变，文字具有更强的符号象征。秦代“书同文”的推行为文字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李斯在此过程中也展示及树立了书法艺术审美的规范。

对李斯笔下刻石作品字形形体进行梳理，不仅能够认识到“小篆书法”字形的来源，梳理古今文字的部分演变，而且能够对其形体的讹变、省减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且有助于寻找“李斯书法”与“秦文字”、“小篆”的千丝万缕联系。

一、《琅琊刻石》之书体分析

首先分析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琅琊刻石》原迹残石，依稀可见小篆字体的造型。根据《山左金石志》中对《琅琊刻石》整体介绍的相关记载：

以工部营造尺记之，石高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⁷⁰

该石原石所刻内容为秦始皇诏书及秦二世诏书，共计 576 字。现存残石为竖直的长方体，仅残存 13 行，86 字，字径二寸。前两行为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东巡至琅琊郡从臣最后两人的官职和姓名；后 11 行为公元前 209 年秦二世补刻的诏书及其从臣的姓名。《琅琊台刻石》应该是现存的秦刻石中铭文内容最长、最完整，形制宏大且内容可信的一块。

残石所刻字内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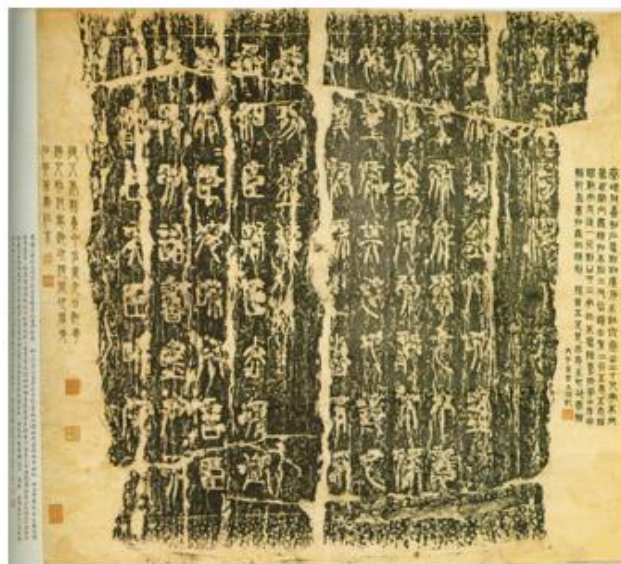
⁶⁹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页 28。

⁷⁰ [清]阮元，《山左金石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七，页 457。

五夫赵婴、五夫杨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⁷¹



《琅琊刻石》原石



《琅琊刻石》明拓本

图三、《琅琊刻石》原石残石、明拓本⁷²

清代杨守敬（1939-1915）曾在《秦琅琊台刻石》跋中讲到：“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⁷³由此可知，《琅琊刻石》即使受损严重，但依然是“神品”。该刻石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是集历史、文化、书法美学于一体，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巨作。

从宏观上观察仅留有 86 字的《琅琊刻石》其章法疏密有致，严肃、规整。其中字与字没有界格，但横成行，竖成列，每个字都占有固定的空间，字的行间距和列间距很大，其圆润用笔和瘦长结体促成了章法上的严谨，字与字的排列则体现了该刻石的规范与整齐。康有为也在《广艺舟双楫》中称赞《琅琊刻石》书体之精美，其中述：

秦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然《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⁷⁴

《琅琊刻石》中的字体，可寻找到与李斯其他刻石作品字体相联系之处，是小篆

⁷¹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35。

⁷² 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 <https://www.chnmuseum.cn/>。

⁷³ [清]杨守敬，《邻苏老人手写题跋》（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页 23。

⁷⁴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页 792。

规整化，定形化的成果呈现。从用笔方面看，《琅琊刻石》具有骨骼清晰、线条刚毅、形象规整的特点。从字形结构和全碑文字形态方面剖析，《琅琊刻石》之上文字有“字型瘦长”、“重心偏上”、“趋于规整对称”、“布局协调”等特点。其中，“其”、“臣”、“帝”三个字与早于其创制的《峰山刻石》、《泰山刻石》摹刻本字形字体几近相同，说明了秦“书同文”是有推行成果的，也是在秦代社会发展中一脉相承的。



图四、《琅琊刻石》原石残石中“其”、“臣”、“帝”字（据图三得）



图五、《琅琊刻石》清严可均仿传世拓本重写本

由于李斯《琅琊刻石》原迹已不足百字，且残损严重，为更直观的对书体进行对比。论文选取清代学者严可均仿传世拓本重写的《琅琊台刻石》进行分析。

清代沈善登评价此本：

字形形体，大小肥瘦。一依旧拓，而补其缺蚀，以成全文，令读者如睹二千年不损真迹，

洵希世珍也。⁷⁵

其中指出此重写版，无论是字形、大小、风格都“一依旧拓”，在保存原来面貌的基础上将其残缺一应补齐，通篇均匀整饬，与真迹接近，观此本犹如真迹。

二、《泰山刻石》之书体分析

再则分析《泰山刻石》，始皇诏书刻在东、西、北三面，共 78 字；二世诏书刻在南面，共 78 字。刻石共 222 字，四面广狭不等。后经时代更迭该石倒地，受风雨侵蚀，仅剩南面较为完好。关于现存泰山岱庙的刻石残石真伪辩，尚存在不同的声音：

据《先秦文史资料》中关于《秦泰山刻石》的描述：

这是秦始皇帝载泰山的刻石，现在泰山顶岳庙，仅残存十个字。清嘉庆年间汪汝弼的题记说……⁷⁶

在《中华艺术文化辞典》中对《泰山刻石》的描述中有：

此石方若及欧阳辅泰均疑为伪。今存山东泰安岱庙东庑。⁷⁷

然而，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论》中的描述否定现存残石为原石：

这些刻石是研究小篆的最好资料，可惜原物几乎都已毁坏，只有琅琊刻石尚有残块存留。

78

但从残碑题跋⁷⁹中可以寻找到该残碑脉络较为清晰的历史来源。

⁷⁵ 沈振斌，《琅琊台刻石》（浙江：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无页，正文后沈善登题跋。

⁷⁶ 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辩》（新北：聊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页 277。

⁷⁷ 严云受，《中华艺术文化辞典》（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页 585。

⁷⁸ 裘锡圭，《文字学概论》，页 59-60。

⁷⁹ 写在书籍，碑帖，字画等前面的文字叫做题，写在后面的，叫做跋，总称题跋。其出自《梦溪笔谈·乐律一》。《泰山刻石》残碑下部跋为：道光十二年（1832 年），泰安知县徐宗干于瓦砾中寻得《泰山刻石》残石，嘱咐道人刘传业将残石移到山下，嵌置在岱庙道院壁间，并作跋记事情的经过。



泰山刻石残碑



泰山刻石残碑局部



泰山刻石残碑（局部修整本）

图六、泰山残碑拓本⁸⁰

如今残碑仅剩秦二世诏书中“斯、臣去疾、昧死、臣请、亦臣”十个字，造型与字形结构与秦“书同文”背景下的文字近乎相似，至少在文字笔画趋势方面和李斯所书相互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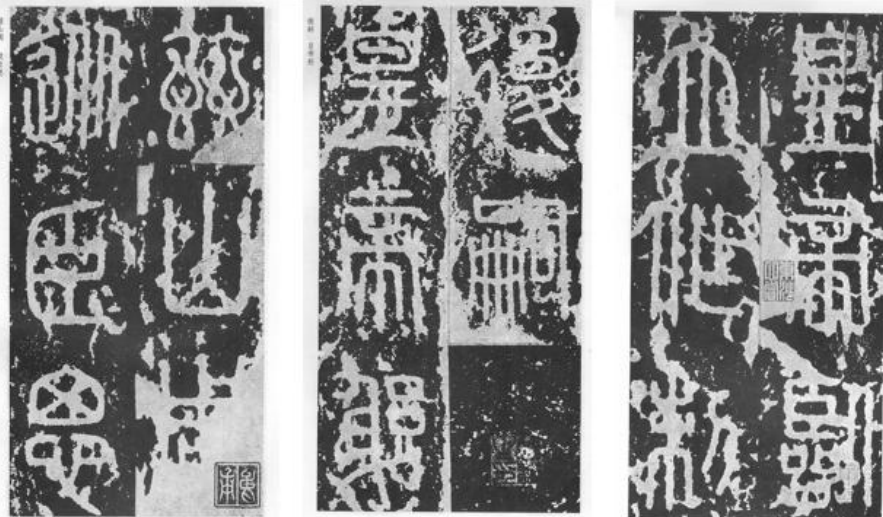
根据徐自强、吴梦麟在《古代石刻通论》中的整理：

宋人刘歧拓本得 233 字，可读者为 146 字，明华中甫，安国递藏本存 166 字，元拓本存 50 余字，明拓本则仅存 29 字。⁸¹

泰山刻石的拓本、重刻本很多，但安国本字数最多为 165 字，且最为精妙，本文所用的拓本即是此 165 字本（故选此本用以第三节书体分析）。

⁸⁰ 图源：〈浅议中国古代篆书与隶书的连带关系〉，宋伯平书画，2020 年 1 月 13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5584254699046530&wfr=spider&for=pc>。

⁸¹ 徐自强、吴梦麟，《古代石刻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页 15。



图七、泰山刻石（安国北宋拓本）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⁸²

《泰山刻石》的小篆书体，线条横平竖直，工整匀称，粗细一致，这是用笔上的一个改革。对于原先汉字笔画有长有短的问题，《泰山刻石》在许多地方把长短笔进行了规范，且文字结构分明，笔画严谨有力，尤其是线条的粗细和轻重的处理到位。从章法上讲，该刻石之上文字用笔凝练，文字结构追求“瘦长”表现，是汉字初步追求符号美的重要体现。比如“皇”、“帝”字和“山”字，字形呈瘦长型，重心偏上，且字体笔画规矩饱满，笔画之间连接自然，这也是其作品充满美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八、《泰山刻石》安国本中“皇”、“帝”、“山”字（据图七得）

唐张怀瓘《书断》中赞叹《泰山刻石》为：“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⁸³元郝经

⁸² 图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226/10/7796166_632095767.shtml

⁸³ [唐]张怀瓘，〈书断〉，页 165。

赞道：“拳如钗股直如筋，曲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⁸⁴此刻石书体字型与李斯其他作品造型一脉相承，除造型细节处艺术化的处理外，字体笔顺及造型与“书同文”背景下其他汉字相差不大。

由此可见，李斯在书法创作过程中的字形结构、书法笔法及文字外形中都做了艺术化的处理，提升了汉字的书写技法与字的艺术造型感，并对后来的书法艺术带去重要影响。

三、《峰山刻石》之书体分析

《峰山刻石》原石已遗失，《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立此石，未录其文。据明拓本补录如下，全文共 144 字：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尊惠，亲巡远方。登于峰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阹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相传，峰山刻石遭火焚毁之后，并不是完全毁灭，而是留有一些残缺的石块。当时的县宰把这一篇文章刻到新的石头上，同时还有一个木刻版本的存在。唐代著名诗人杜甫（712 年-770 年）曾写：峰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⁸⁵

宋欧阳修（1007 年-1072 年）《集古录》：“右秦峰山碑者，始皇帝东巡，群臣颂德之辞。至二世时，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峰山实无此碑。而人家多有传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铉在江南以小篆驰名，郑文宝其门人也尝受学于铉。亦见称于一时。此本文宝云：是所模。文宝又言尝亲至峰山访秦碑，莫获，遂以铉所模刻石于长安，世多传之。余家集录别藏泰山李斯所书数十字，尚存以较模本，则见真伪之相远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⁸⁶

这里分析，郑文宝所翻刻的“长安本”为其师徐铉所摹，而摹本为唐代枣木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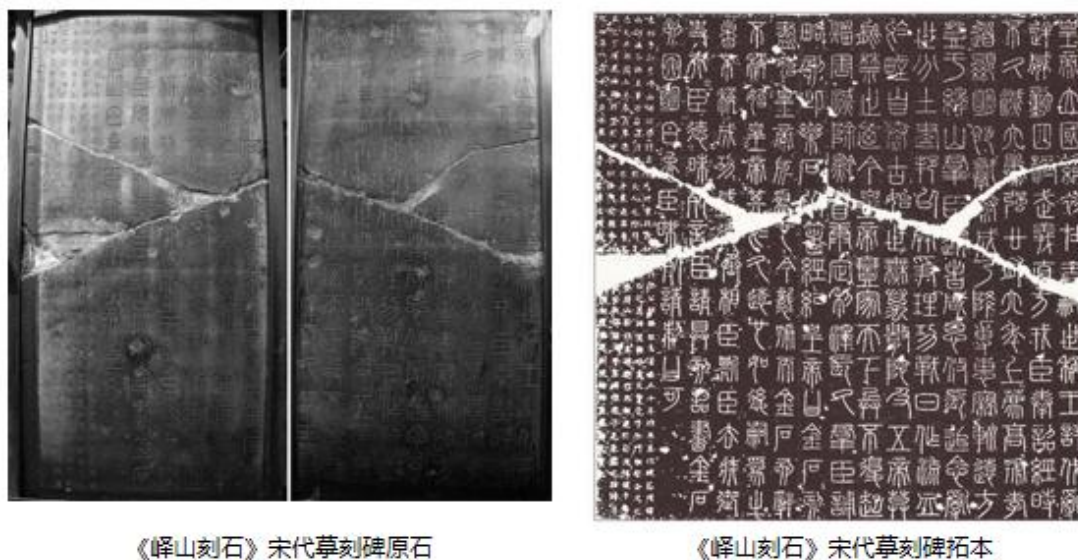
⁸⁴ [元] 郝经，〈太平顶读秦碑〉，2011 年 2 月 24 日，
http://www.taian.gov.cn/art/2011/2/24/art_59116_4347369.html。

⁸⁵ [唐]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杜工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 35。

⁸⁶ [宋] 欧阳修，〈集古录〉，《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页 1100。

而此枣木板是原秦峰山刻石的拓片所摹，也即是说，“长安本”已经经过了三手摹写，郑文宝翻刻已成第四手。但因此本字数最多，且已是最精良的一版。因此本文以“长安本”为底进行分析探索（故选此本用以第三节书体分析）。

下面列出《峰山刻石》宋代摹刻本及拓本：



图九、《峰山刻石》宋代摹刻碑原石及拓本⁸⁷

这里以《峰山刻石》宋代摹刻版（长安本）为原型，从部分字体的体态中探求李斯所书形体特征。



图十、《峰山刻石》宋代摹刻版部分字截取（图“长安本”拓本截取）

分析之，“长安本”刻于宋代，与《泰山刻石》、《琅琊刻石》所刻的秦代已相

⁸⁷ 图源：<https://baike.baidu.com>。

距千年。对比之，“长安本”字体笔画更秀美，更具书法的造型感，多是融入了翻刻者对书体的思考及造型审美。同时，书法发展至宋，更趋于规整化，作品更具布白均匀、法度森严等特征。

但从字形结构出发，梳理上述几字同前文《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中字体形体，无论是从笔画连结，字体结构，还是从各部首位置摆放都近乎相似。从章法和用笔方面剖析《峰山刻石》文字时，抛去后世翻刻中的“秀美”风格而言，其上文字结构延承李斯书法的“重心居上”的体势，笔画严谨有力，处理了笔画线条的粗细和轻重，让整块石刻汉字结构感更加明显。

至此，秦“书同文”之推行意义不难看出，文字的统一规则为汉字“去象形化”提供了基本条件，也潜移默化地引领了文字追求艺术化。

第二节 李斯书法单字对比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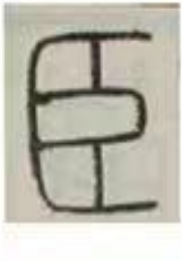








李斯在书法创作中融合自己对书法创作、书法风格、政治思路等方面的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李斯长期以来对书法创作思考的具象化落实。现从《琅琊刻石》（清严可均仿传世拓本重写本）、《泰山刻石》（安国北宋拓本）、《峰山刻石》（北宋拓本）、《说文解字》中截取数字进行对比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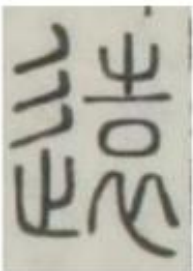

李斯亲笔书写中虽未见“印刷体”般的造型，但在刚刚结束六国战乱社会且文字造型各异的秦代已是起着重要文字规范作用的作品。同时，规范的书写造型体现出李斯对文字符号化的探索，也可令观者寻得“书法”之意趣。

论文通过对比诸山刻石中“皇”、“帝”、“臣”、“奉”“作”、“年”、“明”、“远”、“始”各字（图十一），可以寻得李斯书法自成一章，有规律可循，印证了“书同文”背景下的文字统一的事实。

《琅琊刻石》 《泰山刻石》 《峰山刻石》 《说文解字》

部分单字对比

释文	《琅琊刻石》	《泰山刻石》	《峰山刻石》	《说文解字》
皇				
帝				
臣				
奉				
作				

年				
明				
远				
始				

图十一、《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说文解字》单字对比（据拓本整理）

对比之发现，其书法作品从“规范书写部件，化繁为简”、“确定文字结构，注重比例”、“美化呈现效果，去象形化”三方面相得益彰，耐人品读。

一、规范书写部件，化繁为简

汉字在经过“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转变中，关于书写部首及笔顺等方面的探索是文字“去象形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书同文字”过程中，汉字的各种偏旁的形体在不断摸索中确立，固定于字体中某一位置，且每字体书写的笔画数也是确定的。

将汉字“化繁为简”的过程，主要围绕文字偏旁选定的种类及类型的确定，还体现在文字笔顺的联结方面。由图十一分析，《说文解字》中收录之字，除少部分字笔画位置及笔画长短有区别外，相似度极高，多受李斯书法作品影响。可以说，李斯书法作品为《说文解字》编撰提供了条件与基础参考，是不可多得的在“书同文”时期留下的珍贵书法作品及文字考究参考资料。

图十一所列左右结构之字，从“作”、“明”、“远”、“始”等进行对比来看，李斯自身作品文字各部件严守“书同文”确定的书写规则，左右各部分相得益彰，未见较大变化，无形间树立了书写规则。

二、确定文字结构，重视比例

将文字上升至“书法”之概念，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字形结构的风格确立。在“书同文字”的背景下，李斯书法发挥着重要的实用功能，但同时由于其一以贯之的书写特点，未尝不可称之为书法艺术。

据图十一分析之，李斯作品文字结构字形均整、字内重心统一，给人一种稳定的观赏感觉。其作品重心偏上，且似乎有意为之，成为一种书法特征。这种书法特征在裘锡圭看来，可用美学鉴赏中的比例分析。列举“皇”、“远”、“始”字分析：

李斯笔下之“皇”字，下部王字横画位置分布明显偏上；“始”字将左边女字旁笔画拉长，缩短右半部分，形成长短对比；“远”字亦是如此，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字的重心位于上方。同时从字的外形轮廓来看，李斯之书相得益彰的统一结构，更显书家之风范。

汉字的演变有迹可循，一脉相承。在秦“书同文”背景下，简要溯源李斯书体同金文（钟鼎文）、石鼓文、诅楚文等字体存在的联系。秦大一统前秦国文字承袭金文

造型，到了战国以石鼓文为主。秦统一六国后，施行“书同文”政令，小篆文字的结体造型结构及文字表意方面确能寻得与“石鼓文”和“金文”等的关联性。

《大学书法基础教程》一书将此中联系做以梳理，书中提到：“石鼓文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文字，它是目前我国最古的刻石，被称作是‘石刻之祖’……秦国地处原西周本土，秦国文字承袭金文，成为汉字的正统……石鼓文具有东周、秦国文字的典范性……逐步向小篆发展，是秦代“书同文”的重要依据。”⁸⁸

书中梳理较为全面，在此，略引《诅楚文》进行字形结构对比，其中不难发现“王”、“皇”、“帝”等字均被李斯所借鉴并加以优化，继而融合入自身创作，自成一体。



图十二、《诅楚文》摘录局部

《说文解字》收录编撰的小篆字头承李斯篆书字形均整、字内重心统一的特点，其小篆字的重心与李斯作稍有不同，更靠近中心。但整体字形结构和用笔、笔画方面相得益彰，有“同源”之意。

三、美化呈现效果，去象形化

秦“书同文字”，李斯之书法作品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产物，在整体审美上也可圈可点。自此，文字逐渐去“象形化”，有了独立的造型，走向了“符号化”。

⁸⁸ 庄华峰主编，《大学书法基础教程》（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页 27-28。

李斯的作品线条流畅饱满，具有雍容、庄重之美，在他整齐划一的篆书结体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其对文字独立艺术的探索。



图十三、“作”、“年”二字甲骨文字与斯作文字对比

列举图十一中的“作”及“年”两字，寻得“作”字在两字在古文字中颇具象形化。其中“作”字在甲骨文中下部的“刀”部，在李斯的创作中规整的转化“刀”为部首；“年”字在甲骨文中寓“谷熟”，经过对笔画的重组美化，李斯令文字发挥出了独立表达、符号化表达含义的作用。

综上所述，李斯作品的规范化书写从字体笔顺、字形结构及呈现效果等方面都颇具风格，书法成一家书风。从其刻石作品来看，都具有着相似的审美风格，笔画刚健规整、结构清晰规范，呈现出中国书法艺术的启蒙和进步过程。刻石作品的大篇幅呈现效果总体以简洁、端庄大方为主基调，塑造了书法审美的基本规则。此外，刻石作品构图布局精致、考究，富有艺术感染力，也启蒙了汉字书法鉴赏的美学判断标准。

此外，在“书同文字”的背景下，李斯在追求文字一脉相承的演变与统一的过程中，还塑造了文字的造型美。这种对文字造型美的追求，影响了文字书法的后期发展。

第三节 本章小结

李斯书法创作贯穿其仕途发展，我们看到其笔下作品最具研究价值的是“秦七刻石”作品，力证“秦七刻石”出自李斯之手，为文章后续开展奠定基础。李斯书法是其为政成绩外显的一个分支，章节以具有代表性的、有原石佐证的、摹拓本权威版本的《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及《峯山刻石》为切入点，梳理出李斯书法作品特征，由浅入深，辅以论据，以便后章展开对其意义及影响力的分析。

同时，该章结合文献资料围绕《仓颉篇》、“秦七刻石”阐述李斯在“书同文”背景下的作品创作是具有实用性价值的。《仓颉篇》开创了统一文字的识字读物，建立了“书同文”的标准，为该政令的推行打下了坚实基础。“秦七刻石”的创制一方面体现了李斯书法在“书同文”背景下的对文字发展的探索，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秦代的国家政权权威与规范。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李斯书法作品是秦“书同文”背景下具有代表性的传世产物，其作品对文字研究及汉字书体研究都具有研究意义。章节从规范文字书写部件、确定文字表现结构、美化呈现艺术效果三大方面对《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中的单字进行对比剖析，分析时代背景下李斯书法的影响力。同时，歌颂秦德的“七刻石”书法巨制受国家权威性的保护，才使其在“书同文”政令背景下发挥出价值与作用，成为了推动中国文字史、书法史发展的重要一环。

第四章 李斯书法在“书同文”背景下的影响

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凿史实可考的书法家，也是一位具有极高艺术审美的书法家。其在秦“书同文”背景下组建的规范文字团队对秦系文字进行一系列的省改与整理，形成了结构对称、统一、和谐，空间分割均衡的“小篆”书体。

姚淦铭(1948-2019)在《汉字与书法文化》书中关于“李斯为书法史上首位书家”、“李斯传世秦刻石作品为书法创作”的辩证论述：

无比珍贵的“秦七刻石”作品是书学史上第一次留下有确切书家名字的书艺创作，亦值得载入史册。⁸⁹

传说的仓颉，史籀未能得其真迹，殷之甲骨、周之金文皆不知撰书者之名（甲骨文虽有贞人名，但未知其人之史迹），惟有出自李斯之手的秦刻石才第一次使书家人名与书品相联。同时，斯篆刻石作品载于《史记》之中，篇幅较大，记述并表达了“书同文字”政策在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推行情况。而李斯的经典书法作品均产生在“书同文”背景时期。

宋代羊欣（359—442）的《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记载首位书法家人名即为李斯，列其为首曰：秦丞相李斯。⁹⁰

此外，翰凝等在《中国文化概论》中论述：

小篆，又称秦篆，是秦统一后的规范书体。李斯是中国书法史上有名传世的第一位书法家。

91

王世国在《中国历代书法家评述》中也论述：

李斯是中国书法史的第一位书法家，也是篆书的开拓者。⁹²

由此推论，在“书同文”背景下，李斯书法影响了中国书法史的启蒙与发展。分析之，在秦政权统一的背景之下，李斯书法除在中国书法史产生的影响外，其也是秦

⁸⁹ 姚淦铭，《汉字与书法文化》（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页93。

⁹⁰ [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页44。

⁹¹ 翰凝等著，《中国文化概论》（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13），页204。

⁹² 王世国，《中国历代书法家评述》（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页364。

代政权权威彰显之载体，对字形的塑造过程也影响了汉字的演变。可以说是，正因为“书同文”政令的推行，才使得李斯书法走上了历史舞台，发挥出其影响力。一方面，李斯书法成为“书同文”推行的重要工具，是国家权威彰显及政权巩固之载体；另一方面，李斯书法也在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古以来，国家版图的扩张与民族的统一融合都影响着文字的发展探索。文字与语言也对教化社会民众思想、统一社会各阶层稳定等方面具有一定影响。高峰枫在《拉丁文的社会史》一篇中讲到：

文字与语言的发展为推动国家稳定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罗马帝国时期，拉丁字母（或称罗马字母）经历了产生、发展及演变推广时期。⁹³

秦代“书同文”背景下的小篆书体的产生同拉丁字母的发展及影响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在推动国家的稳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为了彰显秦皇权权威，秦“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⁹⁴，以统一文字“小篆”立刻石，记颂秦德，昭示天下。同时，统一的文字也有助于在疆域之内传达皇权政令，彰显皇权权威。

至此，“去象形化”的李斯小篆成为汉字发展创新与开拓的标志。而汉字是书法的基础，正是有了汉字的固定造型，书法艺术探索才得以萌芽。这些在文字史、书法史方面的影响都是环环相扣，逐渐深入的。

在《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中有对李斯小篆书体有所记载：

李斯变小篆以简易之，其美至矣，其论字之原始，数语足以眩之矣，说文谓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异谓之字，盖中国字之构造，取法于物象之自然，原本于天地之至文，故所谓之文字……⁹⁵

这便说明小篆在文字发展过程中“去繁求简”、“建立文字体系”的探索。追本溯源，小篆书法创作的先驱李斯，其作品就今仅存的泰山、琅琊台刻石残碑之上文字来看，除了可以从恢弘的内容记录中看到当时王朝的发展，也能从文字造型中看出文字之规范，书艺之高超。

⁹³ 高峰枫，〈拉丁文的社会史〉，《读书》2017年7月15日，页78。

⁹⁴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758。

⁹⁵ 张龙文，《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台北：中华书局印行，2017），郭序。

谈到秦王朝统一后施行的“书同文”政策的背景及效果，徐连达（1931-）在《中国通史》中的论述肯定了该政策推行的影响：

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积极措施，不仅有便于当时政策法令的推行，而且对后世也发生巨大的影响。⁹⁶

丛文俊（1949-）在《中国书法史》中论述：

“书同文字”施行情况究竟怎样？秦始皇二十六人权量诏铭均为“书同文字”伊始的作品，内容是庄重的皇帝诏辞，其用字尚且如此，遑论其他。⁹⁷

由此以上，本章将结合“书同文”政策背景，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法，从“李斯书法作为秦王朝权威彰显的载体”、“李斯书法对中国文字史发展影响”、“李斯书法对中国书法史发展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梳理该书体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影响力存在。

第一节 李斯书法为秦代巩固政权之载体

纵观世界史，“书同文字”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字和语言就像一个无形的纽带，沟通着各个民族的联系。近代早期，拉丁语跨越国家、民族、等级和地域的界线，催生了教会共同体、行政共同体、外交共同体，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罗马帝国常被认为是欧洲一统的原型，是第一个勾勒出今日欧洲地理轮廓的政治主权国家，这与其“文字统一”引导是分不开的。

民族文字在社会历史进步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也拥有与拉丁文一样古老而统一的文字，这是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统的根脉。在某种时刻，文字艺术发展及推广程度也代表着这个国家、政权社会影响力的权威性及说服力。对比来看，秦朝大一统后社会底层民众对国家还未建立起信任壁垒，社会教化及思想统一尚在探索阶段。而在此时，社会亟需一种思想文化纽带来带领及教化民众。

在此之前的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局面大动荡、大整合、相互兼并的剧烈时期。

⁹⁶ 徐连达，《中国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页91。

⁹⁷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 秦代卷》（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页367。

由于文字发展因地域有别，诸侯割据封闭与融合相互碰撞，导致文字发展的过程各不相同，以致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⁹⁸

在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后，为确保秦国的政令通达和思想文化之交流。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把“书同文”作为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决策。自此，李斯书法在“书同文”背景下演变成传达政令、拓展文化、教化思想、融合疆域之重要载体。这同时也对秦政权巩固产生着影响，在郭沫若（1892—1978）的《中国史稿·第二册》中，谈到秦始皇巩固统一和“厚今薄古”的措施，强调了文字统一对民族统一、发展及巩固的影响，也提到了李斯参与“书同文字”的过程。

全国统一之后，秦始皇命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工作，以整齐的小篆作为标准文字，以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就改变了战国时代“文字异形”的情况。文字的统一对于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发展和巩固有着重大的意义。⁹⁹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大的变革是秦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高度集权的“郡县制”需要规范的文字统一，作为地方政权的郡、县，就不再具备其前身——分封制时代的诸侯国所具有的独立制定、发布、实施政令的权力，本质上已成为一个纯粹的中央政府派出机构，其传达中央的政令，实现朝廷的有效统治乃为其全部职责。这种政治体制，为确保国家内部各个地域统治手段的一体化，因而也必然要求全国使用统一的文字。因此，秦“书同文字”政策的施行，是秦政权巩固及社会发展之必然选择，此亦给了李斯书法推广及发展之契机。

郑师渠（1946-）在《中国文化通史》中强调了秦代“书同文”对于后世发展的重要影响，书中提到：

秦代统一文字对我国的文化、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在秦代以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过割据局面，各地方言亦不一致，但文字却始终是统一的，而文字的统一对经济政治的统一和发展则起着重要作用。¹⁰⁰

⁹⁸ 许曼，《小篆生成及其对汉字改革研究》（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页 3。

⁹⁹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页 123。

¹⁰⁰ 郑师渠，《中国文化通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 16。

在古代中国，文字的演进往往与王权或皇权紧密联系。“书同文”政策中小篆字体的推行一方面是治理国家、传达政令的必然需求，而另一方面来说，其动机却是秦始皇彰显国威的强烈欲求。这种政治欲求，被隐晦地埋藏在“书同文”的具体条文政令中。

文字也是维系社会团结、巩固政权统一的重要标志。因为文字与权力、权威是血与肉般的联系，文字自产生以来便为王权政治所垄断，不容他人染指，之后更是形成了以新的文字面貌来象征新的政治权力的行为模式。秦始皇诏令施行“书同文”政令，李斯等人以秦朝以前的文字为基础，删繁就简，或颇省改，增损大篆，异同籀文，废除了六国区域性大量的异体字，制定出一种新的标准字体——小篆，作为秦国的统一书体颁布实施。

按常理推论，秦统一六国后要创制一种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这种文字要想获得最佳的通行效率，其最佳方案应是融汇“史籀大篆”及七国文字的特点，相互间取长补短而成。然而李斯创制的小篆书体却只是对原有秦系正体文字的统一整理，全然不顾及六国遗民多数不闻秦文的情况，其通行效果自不如前者。但秦始皇废除六国异文，把在秦系文字之上省改而成的小篆强行推广到各地，这毫无疑问是秦始皇为彰显其皇权威严、秦国国威及消灭异己文化最有力的佐证。

李斯之书法分布在各类秦皇权产物之上，齐整规范的文字犹似体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次序感，彰显出秦王朝的权威性与秩序性。

一、秦刻石之字体与秦权威彰显的剖析

文字是国家政策对外宣传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在当时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时代。文字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社会上层建筑与底层民众的距离，社会大众学习和了解国家政令主要途径就是靠文字的传播。不仅如此，文字的统一还能更大程度上将国家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整合，而对这些方面的积极影响也将作用于国家，影响国家政权稳定政基巩固。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发布“书同文”政令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始皇数次出巡各地，在七处立刻石，颂秦德，昭万代，且皆出自丞相李斯之手。“书同文”统一字体——小篆，被大量使用在此类纪事刻石中。这些由李斯亲笔主持篆刻的

刻石其意义显而易见，用意有两层，隐意是为树立规范文字，加快“书同文”推行进度，其显意则为记功述德，彰显皇室与国家权威，神话秦皇权的巩固。

以下以《峰山刻石》长安本局部字体进行展示：



图十四、《峰山刻石》长安本局部（图源：《中国古代书法艺术》）

上图所示文字由左至右、自上而下分别为：“登于峰山群臣”、“皇帝曰金石刻”、“讨伐乱逆，威动”、“戎臣奉诏，经时”、“尽，始皇帝所为”、“乐石，以著经纪”，记录皆“国之大事”，是秦彰显国家权威的重要窗口。纵观“秦七刻石”在各地树立，它们记载着秦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基本政策制度，以及民风民俗道德观等等方面的内容，具有丰富史料价值。钱穆(1895-1990)在《国史大纲》中也结合各地刻石内容讨论了秦王朝“统整各地制度文化风俗”¹⁰¹。这时的秦文化表现出恢宏大气、功利、集权专制、大一统的特点。

¹⁰¹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 93。

柯马丁在《秦始皇石刻》中论述，秦刻石是外显秦政治主权的载体：

“不仅这些强调全面征服、强调帝国建立、强调社会秩序的石刻本质上是政治性的，立石、刻石的行为本身也构成了巡狩之圆满的一个环节——巡狩，早已被公认为是对政治主权的最高展示。”¹⁰²

李斯规范之书体跃然石上，规范得体的文字结构彰显着秦王朝的威严，秩序井然的字形排列透露着秦王朝的宏伟蓝图。“歌颂秦德”的文本书写，辉煌的气度，典雅的体势，圆劲的线条，李斯书法在雄视天下。透过李斯笔下书法作品，仿佛看到了那个秩序井然，气势雄伟的秦王朝。

笔者从李斯书法的字形方面分析，在此补充说明李斯书法中的文字比例一论。启功（1912—2005）将汉字的上下距离比例精确为：0.382：0.618，也就是其所说的“比例分割线”。¹⁰³而这种刻意探索出的文字比例，在“书同文字”之初，恰被李斯运用到其创作之中。剖析《峄山刻石》中字体，确实呈现出重心居上的状态，细品之确有独有的比例分配规则，彰显着一种王朝的秩序之感。该字体呈现在石刻巨制中，也似在向世人展示秦帝国伟大的政治规范与格局。

在秦王朝巩固政权的非常时期，由李斯书法创制的恢弘石刻作品作为国家的意志传达呈现给世人。严肃规整的字体字形同“书同文”政令遥相对应，也是彰显国家政权权威的较好体现，备受历代书学家、史学家的关注。

二、秦诏版、阳陵虎符字体与秦权威彰显的剖析

“书同文”推行后，秦文化进入成熟期，文化的政治功用日显突出，日臻成熟，文字终于走到了为大一统帝国政治服务的前沿。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李斯“七刻石”作品有详细记载。“书同文”背景下，李斯随秦始皇巡行各地，立刻石过程中，其书法以展示国家统一字体为契机，呈现出来，恢弘巨制必掀起影响。

同时，《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有对李斯书秦代“金石刻辞”的相关记述：

¹⁰² [美]柯马丁著、刘倩译，《秦始皇石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页97。

¹⁰³ 启功，《启功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26。

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¹⁰⁴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¹⁰⁵

这里对“金石刻辞”一词作以剖析。古代用竹简写书记事，又有在铜器和石碑上的刻辞以便于保存并传于后世。秦二世继位后，命丞相李斯在始皇所铸金石刻之后增刻铭文。秦二世铭文又见“秦诏版”、“秦铜椭量”等器物之上，今出土文物也见秦始皇及二世诏书并行出现的情况。由此分析，《史记》中记载的金石刻辞，概括为金刻（载体为青铜器、铜版、权量等）、石刻（载体为石碑、石碣等）两种。

而这些金石刻辞以李斯之书体呈现并记叙着国家大事。在这个过程中，李斯之书体也成为彰显秦皇室权威的重要载体，被广泛运用在彰显皇权权威的产物之上，且被传抄学习。同时，《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¹⁰⁶

由此更能看出，与秦皇权密切相关的诏令发布必定经朝廷谋士所把关，关乎文字一事，必按“书同文”之字体严格产出。

先从“秦诏版”入手，对比之上文字，分析来看李斯书法的影响，剖析该书体在当时彰显皇权权威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及广泛运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统一度量衡，颁布诏书曰：“廿六年（公元前 221 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此 40 字诏书大多凿刻于铜器上，如始皇诏椭量、始皇诏方升、始皇诏权等。

¹⁰⁴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12。

¹⁰⁵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35。

¹⁰⁶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35。



秦二十六诏版（铜制）



诏版 诸字罗列

图十五、秦诏版文字（图源：《中国古代书法艺术》页 248）

关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此 40 字诏书，《颜氏家训·书证篇》有记载：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议于海上。’诸本皆作山林之‘林’。开皇（隋文帝年号）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所。其所曰……凡四十字。¹⁰⁷

《文物秦汉史》中也有述：

这些“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直接刻在器物上，有的则刻在铜版上，嵌钉在铜、铁权或木量上。秦始皇诏版曾在陕西咸阳遗址出土，嵌于权身的秦始皇诏版，曾在山西左云、山东文登等地出土。而秦二世的诏版至今只有传世品。¹⁰⁸

由此看出，此 40 字诏书是秦推行“统一度量衡”政令的良好证据，且被广泛翻刻。由图十五对比之，诏版字体大小不均，或是受篆刻工具、铜制版影响，或是受翻刻工匠技法影响。但其上文字，笔画造型及结体方法同李斯刻石文字如出一辙，字形间未见大不同。

同时，秦代度量衡器除了在陕西的礼泉、宝鸡、西安、咸阳和甘肃的秦安等秦国旧址大量出土外，在山东的邹县和禹县齐国故地、陕西右玉、左云赵国故地、江苏东海县越国故地、燕长城线上的内蒙古赤峰，以及燕长城以北一百多里的吉林省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遗址中都有出土，有力地证明了秦始皇在统一后短短几年内已将统一度

¹⁰⁷ [北齐]颜之推著、周法高撰辑，《颜氏家训集注》（台北：台聊国风出版社，1980），卷 17，页 102。

¹⁰⁸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秦汉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 8。

量衡的政令推行到全国各地。而随之推行的还有“书同文”背景下的诏令推广的载体——文字，短短 40 字迹，却彰显出了当时文字使用秩序。这种环环相扣及从上至下的推广过程，给予了秦政权巩固及彰显皇权权威之契机。

接着分析其中字体：



图十六、“秦量诏版”与《琅玕台刻石》原石部分字对比

对比之，“秦量诏版”字迹清晰，在“书同文字”背景下严守字体规范，无论是从笔画分布还是结体造型几乎近似李斯刻石作品文字。巫建在《造物设计》中对该诏版文字书法造型进行点评，书中有述：

《秦诏版》，青铜刻。古时帝王下诏书，将诏书内容刻在金属版上称为“诏版”。可以存垂久远。秦诏版刻字，风格大体近于东巡刻石，但因金属的坚硬性质，镌刻时曲圆婉通的笔调已经走样，不及石刻、木刻那样流畅，但仍不失为学习秦篆的珍贵资料。¹⁰⁹

对比刻石文字，该诏版颇有李斯书法之风范，更具有“书同文”背景下文字造型趋势。其中，书法笔画及文字结构有章可循，一以贯之，可以看出是“书同文字”的推行成果。《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中也有分析诏版文字之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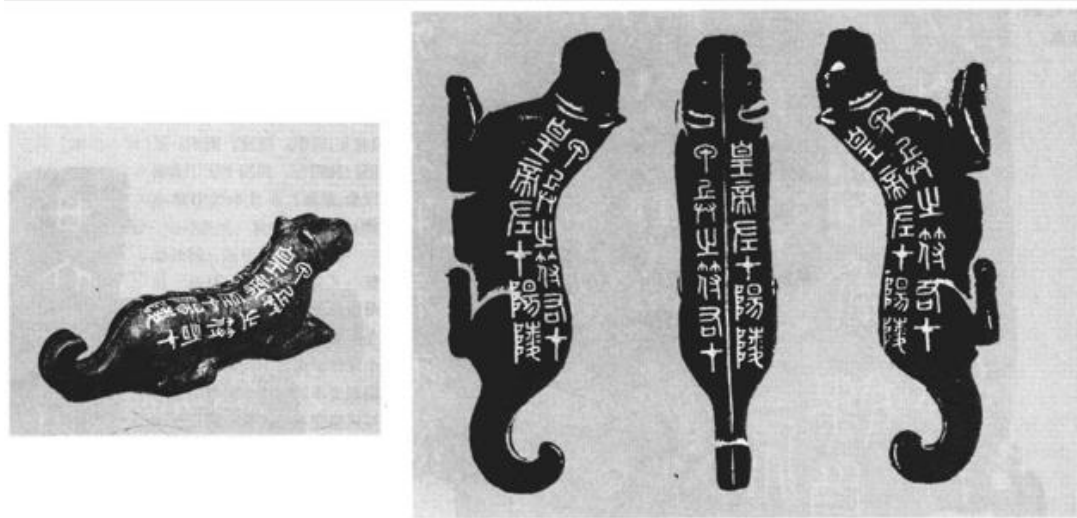
“书同文”之下，李斯书法影响的文字呈现效果，四海之内，皆用一书。观之诏版之上的文字略显笨拙，特别具有古的风趣，但字书皆一致，可见秦始皇统一文字之绩效。¹¹⁰

由此可见，李斯书法在推广秦政令权威的过程中，为推行四海，同“书同文”的

¹⁰⁹ 巫建，《造物设计》（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20），页 108。

¹¹⁰ 张龙文，《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台北：中华书局印行，2017），页 249。

实际应用遥相呼应。今秦诏版的问世，也是展现与记录秦“书同文字”的重要证据。



图十七、阳陵虎符（图源：《篆隶通鉴》页8）¹¹¹

再从“阳陵虎符”观李斯书法之影响。虎符为古代帝王调动军队的信物，符呈卧虎形，背上刻有文字，分为左右两半。阳陵虎符为战国末年秦国所作，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发给阳陵驻守将领的铜制兵符，与“书同文字”为同时期。今出土于山东临城，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符两半各刻有篆书铭文两行，共二十四字。

近代王国维(1877年-1927年)《观堂集林》有述：

文字谨严宽博，骨劲肉丰，与《泰山》、《琅琊台》刻石大小虽异而体势正同……此符乃秦重器，必相斯所书，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晰，谨严浑厚，径不过数分，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¹¹²

据王国维所述，阳陵虎符之上字体为李斯所书。而从虎符之上文字及其产生时期推论剖析，此推论也不是没有根据的。阳陵虎符产生时期为秦统一六国之初，与巩固国家政权权威的其他政令推行尚在同一时期，且虎符之上文字规整有序，字体笔画及偏旁结构精美，字体排列具有空间感，同李斯刻石书法如出一辙，实为精品。

¹¹¹ 司惠国，《篆隶通鉴》（北京：蓝天出版社，2012），页77。

¹¹² 王国维，《观堂集林·下》，卷十九，页13。

由此推论，“书同文”背景下李斯书法被运用在国家统一意志的产物之上，说明其书法被作为一种载体彰显了皇权政治权威。

综上所述，李斯书法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在文字统一方面的谋略体现，还是秦对外展示统治权威的重要载体。作为国家“书同文字”的统一书体，李斯书法造型出现在秦王朝政治产物之上，也体现了该书体之推广成效。

第二节 李斯书法影响少数汉字的演进

中国文化体系延绵不绝，一脉相承。汉字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居功厥伟，其在文化延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汉字是中国文化历史中重要的存在。有了汉字，汉民族才有文字记录历史，从此进入信史时期。汉字的使用也是中国文化从史前时期走向信史时期的界碑。

秦王朝的出现及相关统一的政策推行给予了文字发展及书法发展以空间。丛文俊（1949-）在《中国书法史·先秦 秦代卷》中〈秦代书家与刻石书法〉一节，详细介绍了李斯石刻书法作品的特征及体势，并对李斯书法产生的背景进行了讨论。他讲到：

秦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小篆是古文字的终结……¹¹³

站在中国文化史的角度分析，汉字是文化延承的重要基础。经过时代的更迭，汉民族对文字的发展有了自己的思考，让汉字逐步形成书法艺术。中国历史文化悠久，文化系统中汉字的发展也占了一席之地，成为独有的文化事象。

在秦“书同文字”过程中也伴随着文字的更迭与演变，《说文解字·序》中记载：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¹¹⁴

在高明（1926-2018）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也有论述：

秦代的“书同文”，实际是对汉字形体进行的一次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规范整理。¹¹⁵

¹¹³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 秦代卷》，页 376。

¹¹⁴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 758。

¹¹⁵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6），页 52。

由此观之，“书同文字”的历史背景影响着汉字的发展空间，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文字的演变，也启发着文字对书法形态的探索。

一、“书同文”为汉字演进创造条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六书”（六种造字法）指导下的各诸侯国文字“同字异形”情况在逐渐淡出史册。在“书同文”的大环境下，先秦时期的小篆书，可以视为文字独立发展的时期。

关于古文字形体的分析，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论》中有述：

商末和周初的文字，春秋末和战国初的文字，都很相似，往往难以区分。秦（国）系文字时代的上线是春秋，内容跟西周春秋文字有部分的重复。¹¹⁶

依据这样的划分，秦系文字的探索成为了文字演变过程中的重要过渡。纵观历史，秦人的发展就是一部从弱到强的发展史。秦人的东迁西进，或因政治，或因军事，一路奋斗，一路艰辛，跌宕起伏。随着秦王朝的领土扩张及政权发展，如何处理好各区域间的沟通交流是重要的问题。

文字作为交流沟通的重要工具，在中华文化的演变中一脉相承，承载了记录民族发展历程的责任。秦始皇灭六国，大一统后，为适应社会发展推行的“书同文”政令给中国文字发展创造了空前的机遇。

汉字的演变发端于简便的书写，其结构形态发生过多变化，但总趋势是简化。自商而周，文字一脉相传，至秦变革，“书同文字”，小篆问世，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字史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重要的变革时期，更为今文字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当然，“书同文字”背景下李斯书法为该时期的文字演变与文字形式的确立做出了很大贡献。

丁贞蕻（1933-）在《古代汉语题解》中有关于小篆存在于汉字演进过程中的情况进行讨论：

汉字形体演变的趋势是：由象形化到符号化，由繁复趋向简化。从现存小篆的字

¹¹⁶ 裘锡圭，《文字学概论》，页40。

体看，具有以下一些特点：①书写笔画线条化，笔画圆匀齐整，没有肥笔、尖笔；②笔画固定，符号化；③异体虽有，但不太多。从这些特点看，汉字字形已经定型了。¹¹⁷

从中国汉字演变以及书法史的角度来看，小篆之鼻祖李斯绝对是成绩斐然。在中国汉字史“造字时代”与“造形时代”过渡过程中，李斯书法长久以来被当作模本进行书体引导及思想教化工具。同时，从中国文字史的角度来分析书体特征，“小篆”书体的确立推动了文字的发展，是字体“象形化”到“符号化”的过渡桥梁，也是文字“线条独立化”的见证。

彼时，秦始皇及丞相李斯凭借政治权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小篆”是可能的，但是该书体能在秦王朝短期统治阶段被普遍认可和接受，也一定与该书体的内在合理性、实用性与审美性紧密结合。

古代没有“文字”的名称，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单独出现，《左传》说：“于文止戈为武”，只叫做“文”，一直到李斯撰《琅邪刻石》文中才发现了“文字”二字。¹¹⁸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秦始皇时期对文字发展的重视。

〈琅琊刻石〉文述：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抆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¹¹⁹

同时，为了在“书同文”背景下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作《仓颉篇》供人研习，并启发和开辟了识字模范本的模式，影响至汉代。可以说，若无“书同文字”，汉字的演变将错失时机。

潘重规（1907-2003）在《中国文字学》中对李斯创《仓颉篇》在作为通识课本方面的启发做以总结：

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以后武帝时有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有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有李长《元尚篇》，平帝时有扬雄《训纂篇》，东汉有班固的《续训纂》，这些都是继续李斯《仓颉篇》

¹¹⁷ 丁贞蕙，《古代汉语题解》（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页2。

¹¹⁸ 潘重规，《中国文字学》（台北：三民书局，1977），页12。

¹¹⁹ [汉]司马迁著、[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310。

的字书。¹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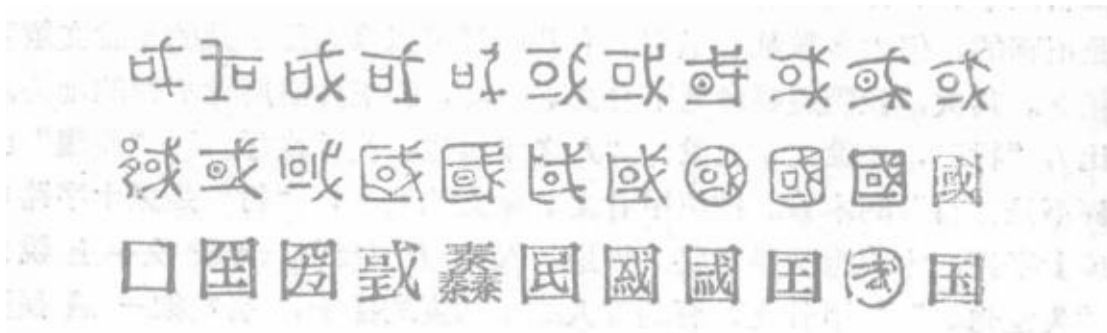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自“书同文”政策以来，汉字演变、发展有了新的机遇，这种契机的产生也给予了李斯书法广泛的发展空间。

二、李斯小篆影响少数汉字演进

时至今日，小篆依然是篆书的灵魂，是研习篆书的重要必修课。而值得一提的是小篆书体是“古文字”的最后一种字体，也是“古文字”与“今文字”过渡的载体，可见李斯笔下书体在中国文字史中的书体演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¹²¹此语出自李斯的《谏逐客书》。秦时的文字文化、刻石文化在整个秦文化这颗参天大树上，只不过是一个细小的分支，且因其见于史籍者十分稀少，传世遗物又极为罕见，以致古今有兴着力于此者，很难求其然。而收罗有关秦文字、秦刻石的一些零散材料，可感受到李斯书法的气韵与魅力，追寻到汉字演变的踪迹。

李斯书法在汉字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秦七刻石的文字造型是其书法艺术风格的主要表现，也连接了“古文字”与“今文字”的过渡，影响了少数汉字的演进。



图十八、“国”字从甲骨文字发展至现在所经形体对比

(第二行右数第三为小篆字体)

(图源：《古汉语通论·上》 页 149)¹²²

¹²⁰ 潘重规，《中国文字学》，页 13。

¹²¹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七，页 3073-30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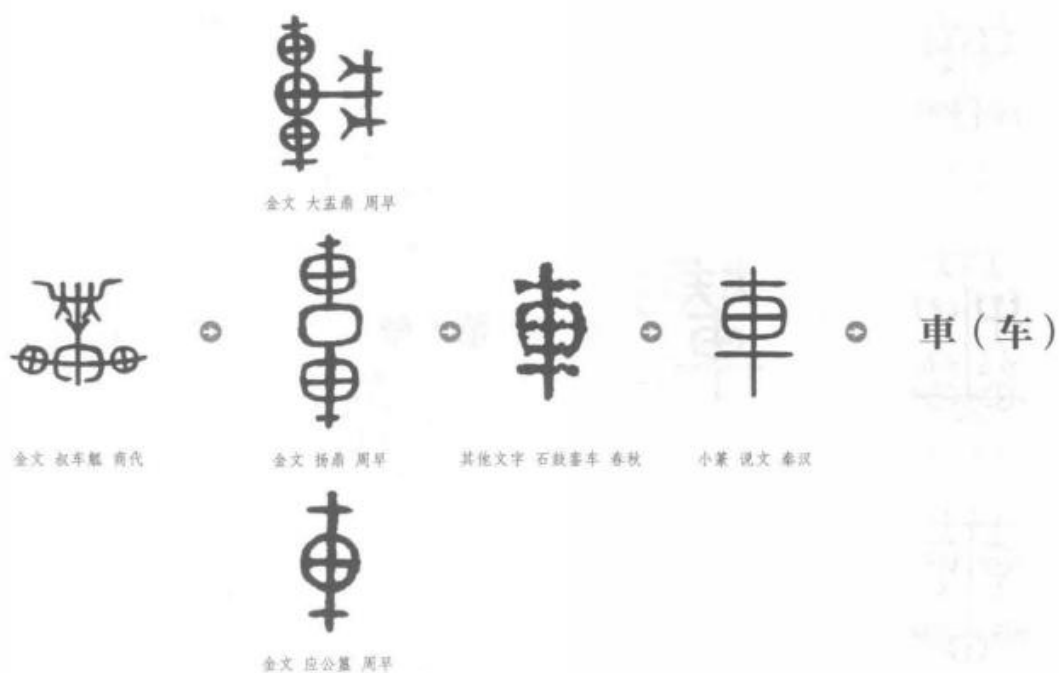
¹²² 古汉语教学小组编，《古汉语通论·上》（湖北：华中师范学院教务处出版科，1964），页 148。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	
楷书		行书		草书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	
楷书		行书					

图十九、“山”、“北”字从甲骨文字发展至现在所经形体对比

(图源:《汉字与书法艺术》 页 215-216)¹²³



图二十、“车”字从甲骨文字发展至现在所经形体对比

(图源:《文字的故事》 页 280)¹²⁴

¹²³ 黄任重,《汉字与书法艺术》(四川:四川美术出版社,2015),页216。

¹²⁴ 刘茵,《文字的故事》(北京:故宫出版社,2020),页279。

以上图列举“国”、“山”、“北”、“车”四字，对比看出小篆字体是汉字“去象形化”的关键过渡阶段。列举其中两字分析，图十八第二行右数第三字为“国”字小篆字体，笔画结构同李斯书法无太大差别；图二十中为“车”字小篆字体，对比李斯书法“巡”字左部偏旁，无大差别。



图二十一、小篆字体同李斯刻石作品对比图

从造型上看，由繁到简，由象形到不象形是汉字演变的一大特征。李斯书法对汉字发展起到了重要承上启下的作用，该书体上承古文字之形，下启今文字创新进步思路，是文字演变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枢纽，也为书法艺术发展奠定基础。

在此，不得不提及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其中整理汉代以前的汉字文体，秦系文字多收录“书同文字”背景下小篆字体。如果没有《说文解字》一书对小篆书体的整理，很多古文字里的写法跟在隶、楷里的写法就会联系不起来，还有不少字甚至会根本失传。

由此分析，小篆书体及发挥“书同文”作用的李斯书法对汉字的演变发挥了作用，影响了少数汉字的演进。再则，文字乃书法创作之基石，正是有了小篆的“去象形化”、“字体线条独立”的进步，才为书法创作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李斯书法启发并影响中国书法史

李斯的书法影响，主要是指其书风在当时对汉字艺术表现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与主动的艺术创作是有区别的。李斯创制的“小篆”书体一方面承载着文字的统一功能，要追求造型的规范；另一方面还蕴含着其本人对文字美学造型的探索。

秦始皇扫灭六国建立秦朝之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¹²⁵，废除六国文字，推行秦篆。但又不是照搬过去的篆书，而是加以省改，成为一种新体篆书。后人为了表示新旧篆书的区别，把新体篆书称为“小篆”，旧篆书称为“大篆”。

秦朝只维持了16年，但是秦朝推行的小篆却有长久的生命力，与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一样，代代相传。推翻帝制百年之后的今天，篆书仍然是书家钟爱的书体。秦王朝下令使用小篆，将整个国家的文字都整合在一起，不仅消除了文字上的异同，而且还极大地改变了古文文字的多样性，对中国文字的演变和书法发展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人用政治手段来统一文字，一方面消极的不再使用那些与秦文不合的六国文字，一方面更积极地编辑字书如《仓颉篇》等来推行小篆，创造一些推行文字的文化滋养条件。¹²⁶就颂秦功德的泰山、琅琊、峯山诸刻石而言，其书体谨严庄重。不但笔书的轨迹没有硬方折的，其笔书线条也极为匀净，比起商周铜器上的文字来，图书性减少，而变化的、线条的符号性增强。

正是有了统一之书体才有书法之启蒙与进步。中国汉字在汉字发展到小篆体时，已逐步定型（轮廓、笔画、结构定型），其象征性减弱，文字具有符号化，从而降低了汉字在书写与识读上的混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使用行政方法对汉字进行大量的规制。从那时起，汉字就具备了許多构成形式美感的要素，例如：线条之美感、单一文字形态之匀称之美感；变化之美与章法之美、体态之美等。

创造一门艺术必须具备两大要素：一是要有技巧的美；二是通过技巧美去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境界。二者缺一不可。¹²⁷身为一国之相的李斯在“书同文”政策实施过程中开始赋予汉字书法美的设计，在“汉字书法美”方面下功夫。他赋予小篆的第一美感是，端正——横平竖直，端端正正，正体现出皇皇大秦，像泰山一样稳固。也正是这种字体的形象，让书法蕴含了书者的个人内心意境并掺杂了社会背景。细细品

¹²⁵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303-304。

¹²⁶ 参考《中国书法史·先秦 秦代卷》，页367述：秦代的法治十分严厉，讲求实效，“书同文字”理应得到社会上下的一体奉行。但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还比较容易办到，而若实现用字者都能掌握小篆规范和书写技术，却需要较长的时间，以及必要的文化滋养。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 秦代卷》，页376。

¹²⁷ 侯开嘉，《中国书法史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9。

之，李斯书法确实是秦王朝的一个缩影。

而李斯书法又不只是作为社会文化发展产物而存在，其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融入到各领域，如融入到秦币钱文中：

根据现有资料推断，我国的货币，起源于殷商，到了东周有很大的发展，而统一于秦始皇。“秦半两”出现。¹²⁸

早期的半两钱文多是粗犷的大篆，秦统一后，钱文则是采用小篆书体。“秦半两”之上的统一铸就的“半两”二字，以小见大，标志着官方文字被普遍运用及推广，渗透到了民众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颇具艺术美的李斯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同民众“打交道”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塑造、影响并产生出独具风格的书法审美观。

李斯书法在秦短暂的王朝统治之下被推广至四海之内，推动着秦书法文化的塑造与推广。一方面，李斯书法的创作给予汉字向书法艺术演变做出启发；另一方面其书法作品呈现的效果启蒙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让书法艺术展现及发展开来。

一、李斯创作启发汉字向书法的演变

始有文字，后有书法，实用观念在前，审美观念后起，这是一般的规律。¹²⁹从书法造型上分析，可以说是，中国文字的“构字法”在小篆书体的产生之前基本定型，文字的“造字时代”结束。接下来，汉字字形努力在均衡、稳定的审美意识系统中自觉地与抽象化、符号化联系、融汇起来。这样的过程为汉字向书法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从而更进一步激化书法艺术的日臻完善与拓展。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说，李斯刻石作品的出现是文字第一次创新承载工具，离开竹帛，离开铜器，成为石刻艺术品。李斯的书法有政治意义，兼具统一文字功能的同时也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书写内容记录并代表了秦帝国的时代精神。其书法在专制的政权统治下被推行到全国并运用到各领域，书法的“审美观”、“规范化”开始逐渐确立起来，这就启发了中国书法史的萌芽。在“书同文”背景下，李斯书法的出现从造型“书艺风格”和“书艺美感”两层面推动着书法概念的成立。其将书法运笔之

¹²⁸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10。

¹²⁹ 姜澄清，《中国书法思想史》（河南：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页63。

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书体也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萌生了对书法规范化及示范化的影响力。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文字和语言载体，文字的发展也记录了历史文化的演进。因此，“书同文”在于减少文化的多样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书同文”强化的是一种强烈的大一统思想，而这种思想是周朝以来所建立的“天下”的概念所没有的，民众的归属感稍显淡薄。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从上到下的思想教化和文化纽带的束缚。

由此可见，秦统一文字结束了战国以来文字异构丛生，形体杂乱的状况，篆书被作为官方权威字体。文字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历史资料等的记载和整合提供了工具和载体。正是有了小篆，秦朝的诸多文化才得以集成和发展，并传至后代。

李斯书法凭借政权影响兴及一时，开启并影响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内涵，为后世留下了临摹佳作。他笔下书法作品通过形象的对比能够清晰看出在书法体例建立方面所扮演的重要桥梁作用。正是有了李斯作品，才能找到“古”、“今”文字系统的衔接，找到中国书法史追求“形象美”的由来。文字是书法之基石，李斯书法承上启下的汉字，又以一种强势的存在影响着篆体体例的发展。之后，篆体的书写在李斯范本的影响下，呈现出独有的造型感，成为“美术字”的一支。

由是而论，在“书同文”背景下，“秦七刻石”呈现出的书法观赏性是中国书法史的重要探索。此外，李斯书法还是汉字向书法演变过渡的“见证者”。

二、李斯书法影响秦后书法的发展

在中国书法艺术中，篆书体笔画匀称，字体道劲庄重，特征鲜明。小篆作为书体演变历程中的第一个正体，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以往文字所表现的随意和繁杂进行了梳理和矫正，还表现在以纯净简约的线条美感和纵势的字形笔画，对以后的书法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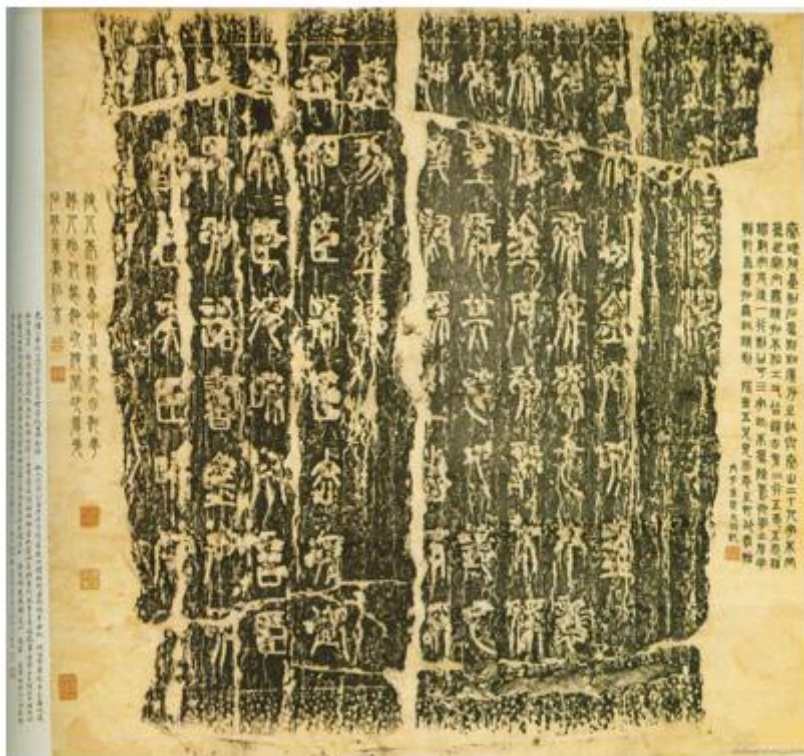
中国书法史篆书体例发展有章可循，结合李斯彼时书法撰写的政治背景，四海之内均研读秦法，简单大方的书写笔画与丰满圆润的结体字形也较为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正是这一韵律成就了篆书在后世发展中的主要行文规则。

历史上，在篆书方面具备突出成就并影响深远的人物合称“三李”。其一便是李斯，属于小篆开宗立派之人。其二为唐人李阳冰（生卒年不详），他追踪秦篆，自比李斯，以更加圆转瘦劲的笔姿写小篆，画如铁丝，自成一派。其三为明代李东阳（1447年-1516年），其所书篆书清劲入妙，典雅流丽，既合乎法度，又不乏玲珑飞动。三人分属不同年代，但篆体创作成果贯穿了篆体书法发展。

另简述清代邓石如、赵之谦两位碑学家、篆体书法家在书法创作中对李斯“碑刻文化”、“篆体艺术”的继承和创新。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看，他们用笔均以藏头护尾中锋行笔为主，取法古人（即为李斯、李阳冰）。李斯之后篆书书法家，无论如何继承与创新书体创作技法，始终坚持遵循小篆书体字形结构和呈现规律，始终坚持小篆书体“重心偏上”、“字形结构瘦长”、“篇幅规整”、“整体风格严整肃穆”等特征。由此，李斯书体影响着篆体书法的发展过程。他在篆体发展中所树立的字形规范规则被后世承继，并发扬创新，影响后世书法（尤为篆书）的发展。

此外，李斯之小篆书体影响深远的过程还体现在其亲撰《仓颉篇》、“七刻石”文字，作品被用于后世研习篆体之模范，刻石拓本再版发行供现今习作者模仿研习，结体形态及造型也是篆体书法沿用之精髓。虽秦王朝更迭快，且篆体很快在民间被隶书取代，但在西汉的官方文书、瓦当、官筑的铜器铭文等可见篆体之身影，形体极受李斯书法端庄规整之影响。而发展到东汉时期，小篆书体出现在《袁安碑》之上，依旧以典雅华美、庄重规范的姿势所呈现。

这里选取李斯书法《琅琊刻石》原石造型文字来评析，分析李斯书法的外表呈现及书法撰写技巧。



图二十二、《琅琊刻石》明拓本

笔者从“书艺风格”与“书艺美感”两方面着手剖析此碑，同时寻找李斯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力。

从“书艺风格”分析：该碑有着极其强烈的自我风格，文字表现出线条之骨劲、力健（虽细则刚、则强），而结体布白极其谨严肃整，雄健而浑厚。且书法表现出了肃穆缜密，安稳端正的造型感，全篇高度统一，法度严谨，不失端庄雅正之气象。似乎每个字都是追求对称，这种对笔法精准的控制，彰显着李斯书法之功底。

古人在书法评述中也记述了对李斯书法作品之观赏感受，他们用“犹”、“似”等字形容出作品的篇幅美感。

唐代书法家窦泉（生卒年未详，活动于 742-755）在《述书赋》中述：

斯之法也，驰妙思而变古，立后学之宗祖。如残雪滴溜，映朱檻而垂冰，蔓木含芳，贯绿林以直绳。¹³⁰

唐代书画家李嗣真（？——696）在《书后品》中述：

¹³⁰ [唐]窦泉，《述书赋》，《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页 238。

右李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绝。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钧强弩，万石洪钟。

131

窦臯及李嗣真比喻李斯书法似“残雪滴溜”、“垂冰”、“千钧强弩”、“万石洪钟”等，皆为赞美之词。

再则从“书艺美感”分析，剖析其笔画。李斯书法中锋用笔，起收笔藏锋；笔画力求严整、粗细均匀、圆润劲挺；结体字形统一偏竖长、对称均衡；字径大小统一，美侔其中。

关于李斯书法笔势的美感分析，唐代书法家张怀瓘（生卒年未详）在《书断》中述：

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斯虽草创，遂造其极矣。李斯即小篆之祖也……李君创法，神虎精微。铁如肢体，虬如骖非。汇海森漫，山岳巍巍。长风万里，鸾凤于飞。¹³²

讲到书法用笔，宋代书法家陈思（生卒年未详）在《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中也表述：

秦丞相李斯曰：夫书之微妙，道合自然，篆籀以前，眇邈不可得而闻矣。

蒙恬造《笔经》，犹用简略，变通斯意，曰：若有笔，当自流美。夫用笔之法，先急回，后疾下，如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此理当自见矣。¹³³

张怀瓘称，李斯书法“作楷隶之祖”，并称其字体有“飞动之感”。的确，其书法结构上的严格的平衡对称给后来的隶书和楷书的字形确定以重要的启示。而书体的“飞动之感”也随人们的审美变化演变着，继小篆之后，用圆转的纵势笔画创作风格

¹³¹ [唐]李嗣真，〈书后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页135。

¹³² [唐]张怀瓘，〈书断·上〉，《历代书法论文选》，页159-160。

¹³³ [宋]陈思，〈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页381。

简约洁净的行草书，人们则称之为“籀篆气”¹³⁴。而“籀篆气”中的“篆”就是受李斯刻石书法风格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历代书画家的评析中，整理关于李斯书法的“书艺特征”，发掘出其书法对中国书法史发展的影响力。分析之，李斯书法作品的整体风格树立了书法字体的排列规则与空间秩序感，尤其是石刻作品所展现出的大气贯通之特征，在“文房四宝——纸”的发明出现后，体现得更加具体。直至今日，不管何种字体书法，仍以整幅作品的气韵与严整内涵为先。

再则分析，李斯书法对汉字线条运用同规则、同方法进行处置，点画粗细均匀，竖笔无垂脚，且结体圆长。其形成的小篆书体体例，经后世沿袭，仍具有独有的特色。在中国书法史上，各字形书法均具独有特征，而李斯对小篆树立的规范则是书法史之最初探索。

秦始皇采李斯之议行“书同文”政策，成为文化上重要的功绩之一。¹³⁵书法艺术在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追求具有积极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代表。寻得李斯书法在书法史方面的影响，也能感受到其对中华璀璨文化的贡献。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章节以“书同文”为背景，分析李斯书法作为秦代巩固政权的载体作用，继而以影响文字演进、启发中国书法史两方面为切入点，结合具体单字剖析该书体的影响。

李斯书法在秦“书同文”背景下产生，其作品承载了国家意志与政权统治内涵，是秦始皇推广、推行国家政令一大工具，也是其展示皇权权威与志向的一个桥梁，更是秦王朝丰功伟绩历史记载的呈现。其书法见于皇权权威产物——诏版、虎符、石刻等之上，规整的作品外显出秦权威统治的次序感。

¹³⁴ 篆籀为秦和先秦广泛使用的书体，可理解为大篆和小篆书体的泛指。篆籀气，即大、小篆书体所流露出的美学意蕴及精神风貌。古体文字所流露的古朴浑厚的气象，即“篆籀气”不仅仅体现在用笔和体势中，还在于整体所呈现出的审美意象中。刘纳，《“篆籀气”研究——以颜真卿《争座位帖》为例》（辽宁：鲁迅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22），页6。

¹³⁵ 洪燕梅，〈秦金文與《说文》小篆害骸之比较〉，《政大中文学报》，2006年第五期，页32。

李斯的石刻文字在彰显“书同文字”字体造型的同时，也衍生出汉字的艺术探索。纵观汉字发展及书法文化，李斯书法是汉字演进中重要的一环。章节在“书同文”背景下梳理出“小篆”在古文字与今文字演变之间发挥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还总结出了“李斯书法”对中国书法史之发展发挥的启蒙作用与影响力。

第五章 结语

行文至此，文章对李斯笔下作品进行了整理，并结合“书同文”背景梳理了该书体对秦政权巩固、汉字演进、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方面的影响。同时，文章引用古籍及今多篇学位论文、期刊论文的有力证点，分条理对该书法体的影响进行论证。

书法史上提出的第一个大书法家那就是李斯。其是篆体鼻祖，是书法之鼻祖，开创汉字之字形结构及结体艺术之美，为汉字发展承上启下。文章以解决“相传的李斯书法为其本人亲笔书写”为研究前提，整理自汉许慎《说文解字》至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关于李斯撰书的记载，为文章开展研究做出铺垫。

李斯书法不仅仅是一个书法艺术品的存在，它还承载了历史发展重任，充当了秦代社会各领域文明传承的重要枢纽。尤其在秦始皇“书同文”政令推行背景下，李斯书法应运而生，颇有“时势造英雄”的意思。纵观“秦大一统文化”，李斯书法是重要的时代产物，也正是这一产物推动了秦社会在极端的时间内走入正轨，拥有丰富的国家盛况，在文字“标准”的确立方面寻找到了恰当的载体。

《史记·李斯列传》中有对秦社会风貌的记载描述：“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¹³⁶这就说明，李斯书法作为一种工具很好的被运用于社会各领域，并对后代产生影响，以极具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特点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是文字史、书法史不可缺少的一环。

文章对秦刻石中李斯书法的内容进行分析，结合《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中的具体呈现内容展开研究。递进出李斯作品的产生同“书同文”政令推行的联系性，尤其是与其刻石作品撰写内容的相关性。随后列举了李斯书法作品，图文并茂进行分析，整理出其书法撰写特征，并结合时代背景谈该书体的产生对秦政权巩固、中国文字史、书法史及时代发展的影响。

完成梳理李斯书法内容后，文章从“书同文”的朝代更替过程中政治、文化、书法等方面的发展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李斯笔下，或者说是“李斯书法团队”笔下的书法作品影响力。

¹³⁶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七，页3070。

结合秦诏版、阳陵虎符、秦刻石之上书体分析，李斯书法是秦代巩固政权之重要载体，统一之书体发挥了为大一统帝国政治服务的作用。结合“书同文”政令推行背景，分析出李斯书法的产生为汉字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小篆书体更是影响了少数汉字的字形演进。文章继而分析李斯在“书同文”政策施行过程中首度赋予汉字书法美的设计，其笔下书体对中国书法史具有启蒙作用。

综上所述，文章从梳理李斯书法内容，到剖析其书体表现形式，再到结合社会背景剖析该书体的影响，内容一以贯之，分析由浅入深。史迹无垠，文章以李斯书法为切入点，由历史碎片中串联秦代社会与文化的丰富内涵，寻找中华文脉相承的记忆，综合观点尚需有志于此论题的学者指教补充。

第六章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
2. [汉]钱玄等，《礼记》，湖南：岳麓书社，2001。
3.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5. [汉]郑玄，《礼记·郑注》，台北：新华书局有限公司，1989。
6. [东晋]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历代书法论文选》，页 133-142。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7. [梁]刘勰著、王更生注译，《文心雕龙读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8.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9. [北齐]颜之推著、周法高撰辑，《颜氏家训集注》，台北：台聊国风出版社，1980。
10. [唐]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杜工部集》，页 35-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1. [唐]窦臯，〈述书赋〉，《历代书法论文选》，页 236-264。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12. [唐]李嗣真，〈书后品〉，《历代书法论文选》，页 133-142。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13. [唐]韦续，〈五十六种书并序〉，《历代书法论文选》，页 301-306。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14. [唐]张怀瓘，〈六体书论〉，《历代书法论文选》，页 212-215。上海：上海书

画出版社，2014。

15. [唐]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页 154-207。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16. [宋]陈思，〈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历代书法论文选》，页 397-400。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17. [宋]欧阳修，〈集古录〉，《欧阳修全集》，页 1100。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

18. [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历代书法论文选》，页 44-49。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19. [清]李兆洛，《骈体文钞（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20.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页 748-868。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21. [清]阮元，《山左金石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2.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海：中华书局，1958。

23. [清]杨守敬，《邻苏老人手写题跋》，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

24. [民国]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25.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 秦代卷》，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26. 丁贞蕙，《古代汉语题解》，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27.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6。

28.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9. 古汉语教学小组编，《古汉语通论·上》，湖北：华中师范学院教务处出版科，1964。

30. 翰凝等著，《中国文化概论》，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13。

31. 侯开嘉，《中国书法史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2. 黄任重, 《汉字与书法艺术》, 四川: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5。
33. 姜澄清, 《中国书法思想史》, 河南: 河南美术出版社, 1994。
34. [美]柯马丁著、刘倩译, 《秦始皇石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35. 刘茵, 《文字的故事》,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20。
36. 潘重规, 《中国文字学》, 台北: 三民书局, 1977。
37. 启功, 《启功丛稿》,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38. 千家驹、郭彦岗, 《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39. 钱穆, 《国史大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北京大学出版, 1996。
40. 钱穆, 《秦汉史》,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41.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42. 屈万里, 《先秦文史资料考辨》, 新北: 聊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43. 沈振斌, 《琅琊台刻石》, 浙江: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3。
44. 施蛰存, 《水经注碑录》,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45. 司惠国, 《篆隶通鉴》, 北京: 蓝天出版社, 2012。
46. 王国维, 《观堂集林·下》,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
47. 王世国, 《中国历代书法家评述》,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1。
48. 巫建, 《造物设计》,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20。
49. 徐连达, 《中国通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50. 徐自强、吴梦麟, 《古代石刻通论》,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3。
51. 严云受, 《中华艺术文化辞典》, 安徽: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52. 姚淦铭, 《汉字与书法文化》, 广西: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53. 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秦汉史》,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4. 庄华峰,《大学书法基础教程》,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55. 张龙文,《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台北:中华书局印行,2017。
56. 郑师渠,《中国文化通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7. 张中天、王宗堂等,《李斯集辑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二、期刊论文

58. 高峰枫,〈拉丁文的社会史〉,《读书》2017年第7期,页77-85。
59. 韓復智,〈對〈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新評〉的新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992年第17期,页19-23。
60. 洪燕梅,〈秦金文與《貌文》小篆害體之比較〉,《政大中文學報》2006年第5期,页32-35。
61. 簡直,〈悲劇性的書寫——評李斯的書法〉,《休閒讀品》2016年第2期,页88-90。
62. 刘鹤翔,〈文化學視野下的“秦七刻石”〉,《中國書法》2015年第10期,页30-37。
63. 苗江磊,〈李斯書法評說的再審視——由張懷瓘《書斷》說起〉,《中國書法》2019年第18期,页71-78。
64. 张国擎,〈書法鼻祖李斯——歷代書法人物之李斯〉,《當代》2019年第2期,页212-219。

三、学位论文

65. 刘纳,《“篆籀气”研究——以颜真卿《争座位帖》为例》,辽宁:鲁迅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22。
66. 许曼,《小篆生成及其对汉字改革研究》,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67. 宗宏宇,《论中国书法线条的审美价值》,河北: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四、网络资料

68. <浅议中国古代篆书与隶书的连带关系>,宋伯平书画,2020年1月1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5584254699046530>。

69. [元]郝经,《太平顶读秦碑》,2011年2月24日,
http://www.taian.gov.cn/art/2011/2/24/art_59116_4347369.html。

附录

《泰山刻石》共计147字所刻: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後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後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¹³⁷

《琅琊刻石》共计497字所刻。前289字为秦始皇诏书,后208字记录从臣名及议立碑刻的事迹:

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转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迹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

¹³⁷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308。

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¹³⁸

《之罘刻石》共计 145 字所刻：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燁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¹³⁹

《东观刻石》共计 154 字所刻：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彊。武威旁暢，振动四极，秦灭六王。阡并天下，留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後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祇诵圣烈，请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¹⁴⁰

《碣石刻石》共计 108 字所刻：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墮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¹⁴¹

《会稽刻石》共计 289 字所刻：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脩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恆常。六王专倍，贪戾沓猛，率众自彊。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

¹³⁸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10-311。

¹³⁹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15。

¹⁴⁰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16。

¹⁴¹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18。

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鞶，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脩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无极，輿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¹⁴²

《峰山刻石》原石已遗失，据明拓本补录如下：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尊惠，亲巡远方。登于峰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随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¹⁴³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着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¹⁴⁴

秦二世诏书共计 79 字，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均并刻于七刻石之后：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¹⁴⁵

¹⁴² [汉]司马迁著、[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28-329。

¹⁴³ 据现存西安碑林的《峰山刻石》宋代摹刻碑整理。

¹⁴⁴ [汉]司马迁著、[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35。

¹⁴⁵ [汉]司马迁著、[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页 335。